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会刊 2017 年总第 7 期

The IFF Magazine www.iff.org.cn

IFF | **14th**
2003-2017
ANNIVERSARY



GUANGZHOU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14届全球年会 (F20峰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17 ANNUAL MEETING
(F20 SUMMIT)

特刊
MEETING COLLECTION

世界大湾区建设： 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4 届全球年会以“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为主题，为打造全球金融领域 F20 峰会，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建言献策。



关于 IFF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2003 年 10 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 G20 国家和地区、新兴经济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及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 (Finance 20) ”。

国际金融论坛(IFF)从创立至今,与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 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共计 2000 多名世界特邀嘉宾,100000 多名全球业界精英参与了 IFF 历届年会和相关活动,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学术研究中发挥了较好作用,取得了广泛国际影响。

宗旨

自 2003 年创立以来,国际金融论坛(IFF)秉持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目标

国际金融论坛(IFF)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确保独立、客观、前瞻和包容性,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促进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以下目标:

1. 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2. 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3. 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4. 全球金融研究智库平台;
5. 全球金融人才培养平台。

本特刊稿件主要来源于 IFF 第 14 届年全球年会,部分文章未经本人审核,特此说明。



国际金融论坛(IFF)会刊
2017 年总第 7 期
www.iff.org.cn

主办单位 / Host
国际金融论坛(IFF)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大会主席 / Chair
陆克文 Kevin Rudd

荣誉主席 / Honorary Chairman
保罗·沃克 Paul Volcker

联合主席 / Co-chair
陆克文 Kevin Rudd
韩升洙 Han Seung-soo
让·克洛德·特里谢 Jean-Claude Trichet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

理事会 / IFF Board of Directors
保罗·沃克 特里谢 肖卡特·阿齐兹 陆克文 韩升洙
Paul Volcker, Jean-Claude Trichet, Shaukat Aziz,
Kevin Rudd, Han Seung-soo
鸠山由纪夫 詹妮·希普利 辜胜阻 周延礼
Yukio Hatoyama, Jenny Shipley, GU Shengzu, ZHOU Yanli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陈云贤
Edmond Alphandery, Domenico Siniscalco, CHEN Yunxian
周汉民 图尔基亲王殿下 张继中
ZHOU Hanmin, HRH Prince Turki bin
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Saud, ZHANG Jizhong

编委会 / Editorial Board
张继中 祝宪 林建海
ZHANG Jizhong, ZHU Xian, LIN Jianhai
宋敏 聂庆平
SONG Min, NIE Qingping

编辑部 / Editorial Department
庄珏 申钢 吴立新
Joanna Zhuang, SHEN Gang, WU Lixin

地址 / Address
广州市南沙区明珠开发大厦 22 楼
F22, Pearl Development Building, Hengli Town,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邮编 / Post Code 100095
Email / info@iff.org.cn
www.iff.org.cn

版权声明 / COPYRIGHT STATEMENT
本刊内容由国际金融论坛(IFF)独家拥有,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或摘抄。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an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IFF, and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excerpted
without permission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4 届全球年会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至 19 日在广州举行。本届全球年会以“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为主题,邀请国际政要、金融领袖、专家学者 200 余人汇聚一堂,为打造全球金融领域 F20 峰会,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建言献策。

2017 年,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经贸投资规则和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亟需培养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世界湾区经济一直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更是全球科技、创新、金融和产业集聚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国际金融论坛(IFF)将以 14 年成熟框架为基础,积极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合作平台贡献力量。

作为创立于中国,由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其领导人发起成立的国际金融外交及战略智库平台,国际金融论坛(IFF)与全球 200 多位财经政要、金融领袖、专家学者,5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和合作伙伴关系。

国际金融论坛(IFF)将继续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实践创新、研究智库和人才培养五大平台功能,积极促进国际金融交流与合作。

我们特别出版本期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4 届全球年会(F20 峰会)特刊,以共享智慧与真知灼见。



张继中
CEO / 创始秘书长
执行委员会主任
国际金融论坛(IFF)



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
Global Bay Area Development:
New Drive, New Growth, New Or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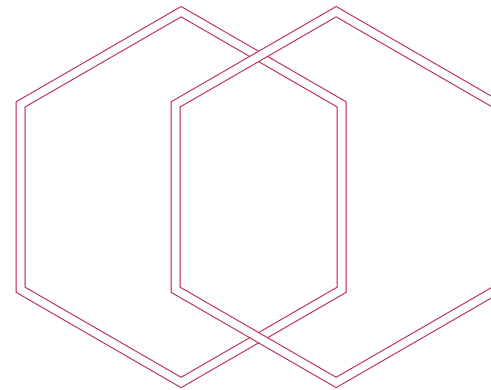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Global Finance 20 (F20)
Finance serves the world

国际金融论坛(IFF)
全球金融F20 · 金融服务世界

战略对话 · 交流合作 · 金融创新 · 全球智库 · 金融人才
Dialogue · Co-operation · Innovation · Think tank · Training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目录 CONTENTS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4 届全球年会以“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财经政要、专家学者和企业领导人分析研判经济形势，共同探讨应对之道。



P8 / 开幕式致辞

- 温国辉 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梁振英 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行政长官
陆克文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
澳大利亚前总理
韩升洙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
韩国前总理
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行长



P16 / 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

- 世界大湾区：构建全球增长新动力
- 粤港澳大湾区：引领创新增长新格局

- 马建堂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韩升洙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
韩国前总理
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阿齐兹 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
巴基斯坦前总理
鸠山由纪夫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委员会主席
日本前首相
辜胜阻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P24 / 世界大湾区建设（1）

- 世界大湾区建设对中国的经验和启示
- 如何发挥香港、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作用
- 构建大湾区全球创新金融中心

P36 / 世界大湾区建设（2）

- 构建大湾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 “一带一路”与湾区经济
-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P44 / 世界大湾区建设（3）

-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新兴产业集群
- 湾区经济一体化：打造世界城市群
- 全球大湾区投融资模式及合作

P53 / 世界大湾区建设（4）

- 世界大湾区如何创建绿色增长中心
- 绿色金融与构建湾区生态型共同体

P59 / 全球经济与金融展望

- 全球金融危机 10 周年：回顾与反思
- 全球平衡与包容性增长



P70 / 全球金融治理：风险、监管与合作

- 全球新金融时代的金融风险与稳定
- 金融监管模式：从机构监管到功能、行为监管
- 共建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P81 / 全球金融创新：新技术革命与未来趋势

- 金融科技：未来发展与创新
- 区块链、人工智能与金融服务

P88 /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

- 如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 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体系
- 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与中小微企业融资

P98 / 国家和区域合作对话（1）

- 中美合作对话会：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的前景及未来

P104 / 国家和区域合作对话（2）

- 中欧 / 中英合作对话会：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的前景及未来

P111 / 国家和区域合作对话（3）

- 中韩合作对话会：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的前景及未来

IFF 永久会址落户广州将有力提升广州的影响力和金融国际化水平

■ 温国辉 / 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温国辉

今天，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4 届全球年会在广州召开，IFF 永久会址也正式落户广州，我们作为东道主感到十分的高兴和荣幸。在此，受任学锋书记委托，我谨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广州是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经过长期的发展，在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港口贸易、对外开放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城市优势和特色。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自贸区、国家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战略在广州叠加实施，为我市新一轮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广州市是历史文化名城，拥有 2230 多年的建城历史，2017 年广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1503 亿元，人均 GDP 超过了 2 万美元。广州枢纽网络发达，白云机场开通国际航线超过 150 条，国际航点 220 多个，广州港开通外贸班轮航线 89 条，建立国际友好港 40 对。去年在广州举办展览 538 场，展览面积 896.5 万平方米，其中有三个展览规模世界第一。

广州营商环境优越，外商投资企业达 2 万多家，有

289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广州发展，创新创业活跃。广州地区有高校 86 所，在校大学生超过 100 万人，科研机构超过 150 个。国际交往广泛，有外国驻穗总领馆 60 个，与 70 个国际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财富全球论坛、世界航线大会、世界港口大会等一批重要会议论坛成功落户。

广州城市宜居宜游，山水成天海相融，全年气候温暖湿润，四季繁花似锦，花卉超过 2000 种，森林覆盖率 42.14%，食在广州，享誉世界，去年入境游客 330 万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伴，近年来广州金融发展迅速，去年金融业增加值 1800 亿元，5 年间增长 133%，全市直接融资余额 1.35 万亿元，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达 65.7%。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广州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49500 亿元，同比增长 9.5%，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33583 亿元，同比增长 13.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国家重要中心城市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增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国际交流对话能级，加快广州迈向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城市进程。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全球金融界的风向标，本次年会高朋满座、精英荟萃，以“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为主题，汇聚全球金融大咖真知灼见，为我们搭建了高层次、高水平的合作交流平台，对提升广州城市影响力和金融国际化水平意义深远。

我们将研究吸取各方智慧和经验，进一步开拓视野、提升借鉴，努力把广州建设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开幕式致辞

IFF 永久会址落户广州将有力提升广州的影响力和金融国际化水平	9
温国辉，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借鉴世界大湾区经验，做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	10
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行政长官	
中国在未来全球秩序中的角色调整	11
陆克文，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国际金融论坛（IFF）向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战略转移意义重大	13
韩升洙，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IFF 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落户广州，立足南沙，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贡献力量	14
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行长	

借鉴世界大湾区经验， 做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

■ 梁振英 /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行政长官



梁振英

今天我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广州参加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4 届全球年会，共同探讨世界大湾区的建设，并且在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做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规划和准备工作，为区域发展提供新动力、促成新增长、打造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 11 个城市，人口 6600 万，生产总值 13000 亿美元，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这些基本情况以外，粤港澳大湾区还有三个特点。

第一，这 11 个城市当中，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实施和内地城市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享有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权。所以，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关系和其他国家的湾区城市不一样。如何在符合“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促进港澳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主要课题。政府要解决好流通的问题，可以释放市场力量，让企业和个人为粤港澳以至周边省市的共同发展提供突破性的新动力。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应总结吸取过去 40 年

粤港澳相互开放、不断改革的良好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相互开放、继续深化改革，在香港高铁站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就是改革的新举措。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之间庞大的基础建设工程陆续完工，这也是外国大湾区城市之间没有的。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速铁路和莲塘 / 香园围口岸，这三个连接香港、澳门、和广东城市的基础建设工程在明年年底竣工以后，大湾区交通成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经贸合作也将更为便捷，这些都将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如果人员和货物的通关程序能更加便利化，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将会更大，内地企业和居民以及外国企业和外国旅客也可以更好地利用香港的国际化 and 超级联系员的优势。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既可以发挥内地和港澳各自的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也将突出中央的统筹和引领地位。加上进出的便利化，香港将更加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的合作将进入历史性的新阶段，华南地区将展现发展新格局。

粤港澳全方位合作的美好成果有目共睹，我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充满信心，我认为在规划公布之后，三地的工商、金融和专业界有必要制定共同的行动纲领。同时，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三地的国内外工商、金融、专业界更频繁和更广泛地集体互访和交流。因为只有三地的企业界以及民众走在一起，才可以形成社会和经济活动，才可以用好规划、落实建设、完成目标。

中国在未来全球秩序中的 角色调整

■ 陆克文 / 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

作为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席，我欢迎大家来到广州参加 IFF 全球年会！感谢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南沙区政府支持 IFF 永久会址落户南沙！南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对 IFF 来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今世界也进入了新时代，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全球经济治理和地缘政治平衡都进入深度调整期。所以，我今天想谈一谈中国在未来全球秩序中的角色调整。

从在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读书开始，我学习中国语言、历史文化已经 40 多年。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中国共产代表大会，包括刚刚举行的十九大，我都会研究学习。多年来，作为学者、外交官、商人、议员、外长、国家总理、朋友、国际公民，我一直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等，我也有幸与许多中国领导人会谈，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以及现任的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还有许多政治局和国务院的朋友们，他们的智慧使我受益良多。所以，作为一个老外，即使有一些局限性，我也和大家一起见证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

众所周知在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澳大利亚经济总量是差不多的，但现在已经有很大差距。今天，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十年内，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同样会超过美国。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有很大增加。更令世界震撼的是中国 7 亿多人脱离了贫困，这很了不起。我小的时候父亲早逝，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有时居无定所，所以我深深知道贫穷没有任何尊严，能从贫困的屈辱中解放是天大的一件事。中国应该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这是几代中国领导人持之以恒坚持对内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对外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这种政策上的连续性同样是中国在未来继续成功的关键。

十九大报告特别重视经济改革和金融安全，并且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必须实施新的经济改革，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实现充分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要从低工资、劳动密集、污染环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高收入、高技能、科技创新驱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平衡充分发展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需要发展服务业和提振国内消费需求，需要坚持继续开放，尤其金融业的开放也是增加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关于金融业开放，包括银行和保险业，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这很好，在西方也受到很大关注和欢迎，大家都希望进一步了解具体的政策安排。当然，每次改革都是一次新的挑战，中国有句话叫“不破不立”，当初中国进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邓小平提出“打破铁饭碗”，我记得这在当时是很敏感的一件事。今天要继续改革，同样要打破一些东西，改革才能继续前进。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光关系到中国，也影响全世界。对世界来说，过去五年的全球经济面临许多不利因素，美欧表现都不太好，世界经济需要新



的增长级和动力源。世界湾区经济可以提供这样的增长级和动力源，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世界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其可以提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打基础。中国以自身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带一路”辐射亚太面向全球的重要支撑区。

我们也要注意国际社会一直关心一旦中国富强，将如何在世界上使用它的财富和力量。毫无疑问，这将对世界格局带来改变，关键是如何改变。十年前，作为澳大利亚总理，我提出了建立亚太共同体的概念，目的是推进区域内的国家合作。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如果陷入零和博弈、冷战思维，政治和战略分歧就会加深，外交行动就会失效，合作机制就会空窗。这也是我开始研究习近平关于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原因，全世界需要认真了解这个概念，了解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这个概念对未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这对中国很重要，对地区很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

国际金融论坛（IFF）通过国际金融交流、对话、

合作，成为一座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桥梁，助力中国和世界良性互动，共同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为促进全人类的永久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国际金融论坛（IFF）向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战略转移意义重大

■ 韩升洙 /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非常荣幸能够出席 2017 年 IFF 全球年会，并在今天的开幕大会上致辞。首先，我要祝贺国际金融论坛（IFF）经过成立 14 年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了一个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化平台，在推进全球多边对话、金融政策制定以及相关事务协商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4 届全球年会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在广州市政府的邀请之下，IFF 永久会址落户广州。广州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也是中国最繁荣和最开放的城市之一。加上香港和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将会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和世界的金融枢纽，也将会以自身的发展大力推动世界的发展。第二，IFF 已经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将自己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广州，因为广州是中国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城市之一。现在全球也正在迎接第四次产业革命，我相信粤港澳大湾区将会引领中国实现更多的创新发展。

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柱，对于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金融产业的发展也非常关键，尤其是中国坚持开放走向国际，对于全球金融格局

也有重要影响。我相信国际金融论坛（IFF）的所有成员都将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共同推动大湾区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枢纽。为实现此目标，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大湾区的创新潜能，进一步更新完善大湾区的金融工具。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亚洲经济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全球经济因此经历了将近 10 年的低迷增长，现在终于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曙光，一些经济活动也开始重新焕发出活力，这是大家引颈期盼的情形。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的许多弱点和问题，比如监管松弛、政策协调不够、风险管理缺失等等。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领导人不断思考应该如何改革全球经济架构，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运行，并避免金融系统可能出现的风险，其中包括加强金融体系的监管。应对金融危机需要引入了一些反周期以及宏观审慎的政策，也要加强全球安全网络，以加强地区和双边的金融安排。

目前全球经济尤其是全球金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时期。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有效推进可持续发展，IFF 的成员将在其中扮演非常积极重要的角色。

在全球经济和金融进入快速复苏道路的背景下，国际金融论坛（IFF）战略转移至粤港澳大湾区，我相信 IFF 将在推动大湾区建设方面发挥出更大的潜力、起到更大的作用。

IFF 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落户广州， 立足南沙，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金融枢纽贡献力量

■ 金立群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行长



金立群

作为国际金融论坛（IFF）的老成员，我曾经长期主持国际金融论坛工作，14 年来 IFF 历经风雨，迎来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新发展时期。在此，我谨代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国际金融论坛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祝贺，对 IFF 永久会址落户南沙及建设南沙国际金融岛表示大力支持，同时对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的全面支持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成长期，世界湾区经济一直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世界湾区更是全球科技、创新金融和产业集聚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是中国建设全球城市群和商业空间的重要载体。2017 年 3 月 6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7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见证下，《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十九大描绘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等战略措施，国际金融论坛（IFF）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落户广州，立足南沙，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金融合作示范区，充分发挥 IFF 全球平台、全球资源、全球网络、全球智库的作用，建立面向世界的全球金融 F20，这无疑将是最具有新时代发展理念的重要创新。

国际金融论坛（IFF）已经走过了从初创时段到稳步发展的 14 年历程，即将迈入第 15 个年头，也将迎来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本届年会作为 IFF 落户广州的首次会议，以“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为主题，汇聚全球智慧，旨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为提升珠江三角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国际门户功能做贡献。本届年会是 IFF 向高层次、高水平、国际化迈进的重要一步，也是向国际展示广州新形象和金融底蕴的重要契机，更是广州吸引全球高端金融资源和要素的重要平台。

本届年会是 IFF 向高层次、高水平、国际化迈进的重要一步，也是向国际展示广州新形象和金融底蕴的重要契机，更是广州吸引全球高端金融资源和要素的重要平台。

为提升珠江三角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国际门户功能做贡献。本届年会是 IFF 向高层次、高水平、国际化迈进的重要一步，也是向国际展示广州新形象和金融底蕴的重要契机，更是广州吸引全球高端金融资源和要素的重要平台。未来 IFF 将充分发挥



论坛五大功能作用，加强交流合作，为进一步促进国际金融公共外交，加强 F20 全球网络建设，发挥 IFF 丝路国际联盟的作用贡献力量。

我们希望五年之后，也就是 IFF 成立 20 周年之时，迎来 IFF 成为全球 F20 的盛大庆典。届时，希望在各位共同努力和见证之下，IFF 能成为继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之后的第三大拥有独立法人机构、独立总部会址、独立国际话语权平台的世界型论坛组织。

在这里，我们既要向过去 14 年 IFF 200 多位成员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在新发展时期、新发展阶段，IFF 能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能够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精力参与到共建 IFF、共建全球金融 F20 的事业中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优势、动力和机遇

■ 马建堂 /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马建堂

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回暖，经济复苏向好，困扰全球经济已经十年的通缩以及需求弱化的格局有望反转。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经济已经进入上行的周期，预计 2017 年、2018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3.6% 和 3.7%，均明显高于 2016 年的 3.2%。全球经济之所以有望走出十年的困境？根本原因是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生命科技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市场化、产业化，创造出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这些新经济又通过城市加速度的机制，在滋生扩张的同时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转型，成为世界经济内生可持续的新动力。当前，中国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面貌，也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

一是创新驱动战略，培育壮大了新动能，支撑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质量的提升。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风起云涌，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全方位市场化、产业化，带动了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改造、转型和升级。据世界权威媒体报道，目前中国科技独角兽企业已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在科技大潮的推动下，中国的分享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层出不穷，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涌现，为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就业稳定、质量效益提升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支撑作用。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供求格局，促进了经济的再平衡。中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落实有效，特别是去产能、企业兼并重组等重大举措，明显改变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的供大于求格局。供求格局一定程度的修复不仅直接改善了供给侧的质量，而且带来了工业产品，特别是大宗原材料产品的价格回升，企业营业收入的较快增长和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的明显增长。与此同时，简政放权等改革优化了中国的营商环境，便利了新经济主体的诞生，今年前三季度，新登记企业日均 1.6 万多户，进一步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以科技革命市场化、产业化为主要动因的经济长周期，与我国经济优化发展期交汇重叠，为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为粤港澳大湾区增长新动力的培育、经济增长新格局的塑造提供了历史机遇。

湾区的率先发展一直是全球经济版图中的璀璨明星，并展现出自身的独特优势。纽约湾区依靠的是金融业大繁荣；旧金山湾区受益于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东京湾区有金融业、航运业双轮驱动。上述三大湾区的发展共同特征、共同路径就是打破了资源流动，形成了基础设施一体化、区域分工协同化、要素流动自由化、营商环境包容化的发展格局，都经历了由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创新经济的阶段性转变，经济活动的范围不断拓展，最终实现多级增长。

粤港澳大湾区基础雄厚、潜力巨大，GDP 总量与纽约湾区相当，是旧金山湾区的两倍，进出口贸易额是东京湾区的三倍以上，世界三大港口机场旅客吞吐量居各湾区之首，人才、体制、区位、政策、产业等优势日益凸显。历史正在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假以时日大湾区定

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优势、动力和机遇	17
马建堂，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新开始	19
韩升洙，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发展开辟新空间、带来新机遇	20
阿齐兹，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独特优势和潜力	21
鸠山由纪夫，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	
粤港澳协同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	22
辜胜阻，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会以其更为开放的经济结构、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更强大的外溢功能、更发达的国际网络，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强力引擎，不仅带动中南、西南等泛珠地区的发展，而且会成为“一带一路”的金融、信息、科技、商贸的枢纽，为中国走向国际分工的高端，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将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面临新机遇、新时代提出新要求。新时代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进一步挖掘好、整合好、利用好以下三大独特的优势：

首先要发挥好区位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优越，向北连通中国的中部城市群，向南联系东南亚地区、向东紧贴海峡经济带、向西连接北部湾经济区，湾区交通发达、产业链条完整、科技创新要素丰富、人才汇聚、对外开放程度高、国际金融及专业服务突出，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推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加强基础设施的规划协调促进合理的错位发展，要加强人才交流、资讯沟通，形成优势互补，要推进内外区域合作，全面提升辐射带动作用。

其次，要积极整合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两大一线城市、三个自贸区，对内对外竞争优势明显。在新时代要发挥新优势、敢于新作为，实现新跨越要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共建健康湾区，打造大湾区优质生活圈；要积极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的有序

自由流动，形成有利于现有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新产业成长的生态环境；要推动金融有序发展，扩大港澳与内地双向流通，打造引领泛珠、服务“一带一路”和全球的金融枢纽。

最后，要挖掘体制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是“一国两制”以及三个布局各具特色的经济体系，大湾区的多元差异是世界上最任何湾区都不具备的。工作做得好，这种差异性将会为大湾区的发展带来多元文化、互补互建，会为大湾区经济发展带来复合优势。广州、深圳、香港互补性特大城市群将为大湾区创造更多的经济辐射、资源共享、人才集聚，可令珠三角的发展再上新台阶，为中国经济跃升再添新动力。加快建设更加富庶、更加文明、更加美丽的粤港澳大湾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南粤儿女和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使命，让我们共同期盼之、拥抱之、奋斗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新开始

■ 韩升洙 /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湾区之一。广东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7.8%，进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 23% 和 26%，手机、彩电、空调、冰箱的生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46%、51%、49% 和 40%，广州同时也是电商和 IT 业的中心，故此人们把广东的广州、深圳区域称为“世界工厂”。广东是中国最富有活力的经济地带，粤港澳大湾区将其下辖的 11 个城市与香港、澳门合在一起共同发展，我们相信粤港澳大湾区肯定可以与其他几个湾区一起竞争。

在中国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之中，广东省的经济增长额预计能达到 6.5%，将有力提升中国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助力中国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加快国企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降低国企在能源、电量领域

的垄断作用，并促进绿色能源的增长以及碳排放的减少。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五年发展规划中，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一。比如说，废物的管理、污染的治理，以及新能源、替代能源、风能、电能、太阳能、核能的发展等都将成为中国的政策重点之一。中国的服务业、制造业也在进行着变革，这些都将推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同时也能够降低收入的差距。

最后，我也想表明，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金融业的改革也是重点之一。我们今天相聚于此，国际金融论坛（IFF）的所有成员都在为金融业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国最近也宣布要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推动跨国企业之间的合作。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也表示，政府将会在商业银行、证券、债券和保险等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限制。我相信中国新一届的领导层将会带领中国进入更加开放的市场阶段，会让中国的国内经济更加制度化，会让中国市场更加繁荣。目前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转型期，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2017 年在广州市政府和南沙区政府

府的邀请下，国际金融论坛（IFF）将自己的总部转移至广州南沙，我们相信 IFF 永久会址落户广州南沙定将带动这里成为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和新格局，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增加一句话，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该是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新开始！

“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发展开辟新空间、带来新机遇

■ 阿齐兹 /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阿齐兹

广州是历史悠久又具有创新活力的城市，是世界工厂，是创新和创业的中心，整个地区的历史文化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之一，相信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将远远超越今天的成就。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我们，将会受益于此地的发展，这个地区的发展又将会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创新、创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参加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IFF 为我们相互结识、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没有一个市场、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孤立存在、孤军前行，都需要合作伙伴、互利共赢，这也是 IFF 这类平台的重要之处。中国召开的十九大展现了其领导力，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全球发展非常重要。我觉得“一带一路”会给世界带来很大变革，它也会带来很多发展机遇，我们只有认真学习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本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如巴基斯坦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因为我们意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很多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涉及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如道路、能源、港口建设项目等。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们也非常骄傲能够与中国有这么好的友谊。巴基斯坦非常希望能够继续扩大和深化两国间的合作。

我们应该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全球化思维来思考，而不应陷入狭隘的国家或地区保护主义思考模式，我认为“一带一路”将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我还想再补充一句，我们的生活一直在改变，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应该把改变视为一种威胁，而是应该视为一种机会，改变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营收、更多创新以及更多的增长机会。要更好地利用改变，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中国已经经历了结构性改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市场变革。世界需要更多“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我们都应该积极拥抱改变。“一带一路”倡议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巴基斯坦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历史上各个困难时期，中国都给予了巴基斯坦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一带一路”更是有力地促进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所以我们非常有幸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巴基斯坦需要真正的互联互通，国际金融论坛（IFF）助力我们实现互联互通，给我们提供平台互相交流合作和学习借鉴彼此的经验。在这里我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我们非常支持“一带一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作为一个巴基斯坦人我会有中国这样的朋友感到自豪，相信随着中巴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两国经济一定能持续向好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独特优势和潜力

■ 鸠山由纪夫 / 国际金融论坛(IFF)顾问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



鸠山由纪夫

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非常巨大的发展潜力，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东京湾区的人，这是我来到这里后的切身感受。

东京湾区没有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体化、高速度发展。但要建成国际金融枢纽，还需要人、财、物和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汇聚了一定的人和信息，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日本和东京学习的地方。

东京湾区包括横滨在内，今后也会成为日本的经济发展中心，它的面积当然不能和粤港澳大湾区相提并论，但确实是一个容易聚集企业的好地方。最重要的是东京湾区不只引进大企业，还积极引进各类中小企业发挥它们的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可以在湾区的发展中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上

个月我访问了清华大学，在环境、IT 等研究领域学生们得到了国家和大学的各类资助。比如清华大学为学生配备的课桌上就有很多网络创新。学生们朝气蓬勃努力向上的样子，让人可以感受到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希望，这是在日本很难见到的景象，也许在美国是有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多大学，广州市就有 100 多万在籍的学生，这些大学生是未来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才。

大湾区发展应该进一步提升集聚性，应该让居住空间更方便舒适，其中包括就医的便捷，大湾区应该有一些具备高度医疗技术的医院。日本在癌症治疗方面有很多高端精尖的技术，我们希望这些技术可以惠及世界、惠及中国、惠及大湾区。我们非常期待高精尖的医疗机构落户大湾区，并且能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与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有其独特的优势，我们需要共同合作充分发挥它的优势。日本的安倍首相曾说，要把日本建设成最能够发挥企业优势的国家。那么最能够发挥企业的优势，是不是就能够直接给人民带来幸福呢？这一点我是有疑问的。中国发展的目标是为人

民谋幸福，为此大家共同努力去建设城市，这样的努力也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最后我还想提一句，我一直提倡建设东亚共同体，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们要跨越国界让所有的人都能幸福，我们要共同努力建设这样一个地区，这对我们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中国能够发挥它的关键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多大学，广州市就有 100 多万在籍的学生，这些大学生是未来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才。大湾区发展应该进一步提升集聚性，应该让居住空间更方便舒适，其中包括就医的便捷，大湾区应该有一些具备高度医疗技术的医院。

粤港澳协同打造世界一流 创新经济湾区

■ 辜胜阻 /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辜胜阻

十九大报告从国家发展大局的角度提出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澳门的发展同内地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要实现互利合作。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首先就是要深化港澳和内地融合，打造国际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其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可以助力“一带一路”的建设，培育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是当今国际经济版图中的突出亮点，全球 66% 的经济总量、75% 的大城市以及 70% 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都集中在海岸 100 公里的地区。

湾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型经济四个阶段。现在全世界有三大湾区，一个是以纽约为中心的金融湾区，一个是旧金山为中心的科创湾区，还有一个是东京产业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第四个湾区。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 GDP 之和超过 9 万亿人民币，总体经济规模和韩国相当。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数量和法国相当。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湾区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多，GDP 目前位居第二，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

快的。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主要有以下六个特征：

第一，大湾区是一个先进的港口区，有容海抱湾的区位优势。大湾区是湾区群、港口群和产业群，也是城市群。大湾区有广阔的经济腹地，是构建“一带一路”经济的引擎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心脏，现在广东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比重超过了 20%。

第二，大湾区有完备的高端产业群，有健全的现代产业集群和金融服务支撑体系，有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有利于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

与世界其他三个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体系更加完备。它不仅有以科技创新闻名的深圳，也有金融高度国际化、市场化的金融中心香港，还有传统制造业非常明显的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现在要聚焦八大产业，过去它是世界工厂，未来它应该走向世界经济。香港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融资、投资以及传统服务，在内地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之间，扮演非常重要的转换器作用，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是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香港还是成熟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重要平台。中国海外投资的 60% 要经过香港，所以它扮演着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第三，大湾区是发达的城市群，能够带动区域的分工合作和区域发展。有以香港为核心的大珠三角金融与物流中心圈，有以深圳为核心的硅谷创业创新高端产业中心圈，有以整个区域为基准的智能制造及教育文化旅游产业圈，拥有丰富的教育与科研资源以及一大批创新性国际化领军人才。所以大湾区城市的市场化、国际化水平是非常高的。

第四，大湾区有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网，有丰富的教育与科研资源，有一大批国际化的创新人才，在这一方面堪比旧金山湾区。世界排名 100 以内的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有四个，比其他湾区都要多，所以大湾区具有科教资源的优势。

粤港澳地区的创新指数位列世界第二，所以它的创

新指数、创新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深圳是大湾区创新型经济的主引擎、领头羊。深圳的研发强度达到 3.5%，是新加坡的 1.7 倍，是香港的 5 倍。近 5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的数量已经超过旧金山湾区，其中深圳的发明专利占比很大。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具有创业、创新、创投铁三角效应的城市，VC/PE 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

深圳的创业创新人才，一是海归系，深圳有 8 万海归留学人员；二是孔雀系，就是全国各地孔雀东南飞到深圳来创新创业的人才；三是本土的深商系；四是裂变系，就是从行业头部大企业出来，自己创办企业的人才。深圳的产业链和创新链是由大企业和众多中小微企业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深圳拥有 350 家上市公司。

第五，大湾区是优质资源和要素的栖息地，有开放多元的包容环境和“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香港、澳门的制度优势是“一国”是靠山，“两制”是特色。“一国”之利、“两制”之便，特别是内地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

第六，大湾区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网，有高效的物流体系和便捷的生活环境。粤港澳大桥是大湾区基础设施方面的标志性工程。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空市场规模领先全球，超过了世界其他三个湾区。

大湾区要实现一体化面临三个难题，一是区域本位主义、二是同质竞争、三是体制障碍。大湾区的香港、澳门在与内地合作中要解决三个落差，一是运行机制的落差，二是体制机制的落差，三是文化环境的落差。

大湾区粤港澳三地的合作从过去到未来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8 年到 2003 年，是前店后厂的制造业垂直分工合作；第二阶段从 2003 年到现在，是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产业横向整合期；第三阶段从现在到未来，是以大湾区经济为载体的共同参与国际中高端竞争的新阶段、新时代。所以，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合作是早就有的，现在只不过是更高水平上推动协同发展。

第一，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具有优势互补性。每个城市都有不同定位，比如深圳是新经济领头羊，广州是综合性交通枢纽。不同定位体现出它的互补性，正是因为这种互补性所以迫切需要协同发展，进而构建分工协作体系。

第二，协同发展需要融通和联通，这个“通”是关键字，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非常重要。有深度的互动融合是各个方面共同的需求，要互利共赢，必须要融合。所以要实现路通、人通、商通、财通、政通。

第三，从优势互补到优势整合，从各展所长到协同共进，从各自精彩到共同繁荣。协同发展需要构建有效

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机制可以分为四个层面：法律层面、市场层面、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有六个方面的重点，基础设施、创新、“一带一路”、产业价值链、金融、宜居宜业的环境。

第四，深度的融合需要产学研企的合作，人才是第一要素。港深澳能够为湾区提供科技创新资源，特别深圳和香港联手可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广东省提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这个规划正成为重要的协同发展载体。广深科技走廊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能力强，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目前深圳在创新创业、在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方面，特别是发展创新型经济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空间资源。深圳面积 200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现在有 2000 万，所以它的空间制约非常严重。大湾区内广东省的九个城市中，深圳的房价排名第一，这种高房价对创新人才产生的挤出效应，深圳要高度重视。

深圳需要吸引一流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硅谷之所以是硅谷，就是因为有斯坦福，硅谷的创业者 60% 毕业于斯坦福，深圳亟需类似斯坦福这样的一流大学。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南向与香港合作、北向与广州合作，广州和香港都有世界一流大学，通过这种“合创走廊”载体建设，可以解决深圳缺乏一流大学 and 高端科研机构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其中将遇到的挑战不容低估

■ 祝宪 /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祝宪

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四是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包括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聚集。

第二个问题，作为城市群的大湾区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条件就是如何融合和分工。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要推动港澳和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融合，另一方面是要促进合理分工协作，避免内耗和重复建设。

在融合方面，一个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的梯度转移，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要构建以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辅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乃至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进而把大湾区打造成“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枢纽。另外是大湾区内的城市资源共享方面的融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除了在金融、制造业、服务业等方面，在医疗、卫生、社保方面也要推进互通互认和互享。

从分工方面来看，目前广州、深圳、香港三地的经济总量基本相当，在大湾区建设中如何战略性地看待这三地的分工和定位十分关键。分工的重点也可以在航运港口交通、金融和科技创新这三个方面。

航运方面，香港是重要的国际中转港，这就需要广州和深圳两地合理区分港口功能，实行差异化竞争。在金融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是南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广州则要差异化地发展特色金融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金融服务城市。

在科技创新方面，香港具有比较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成熟的资本市场，而深圳正在打造中国的硅谷，广州计划打造国际创新枢纽，这也需要有差异化的顶层设计，使分工竞争能够有序进行。

大湾区 9+2 中的珠江三角洲 9 个城市要明确各自的战略定位，取长补短，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无序竞争，通过发挥协同效益，增强整体竞争力。

第三个问题，金融创新是大湾区建设的独特优势。

在大湾区建设中，深圳堪称创新高地，不断催生新生代、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大湾区中广东其他城市具备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扎实的制造业基础，而香

世界大湾区建设（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其中将遇到的挑战不容低估	25
祝 宪，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27
梁锦松，南丰集团行政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	
吸取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经验和教训，全力推进大湾区建设	29
钮小鹏，美国史带金融财团全球合伙人、史带战略控股集团总裁 /CEO	
利用耐心资本为粤港澳大湾区筹资	30
王 燕，国际金融论坛 (IFF) 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四个问题	32
夏 乐，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既需要顶层设计，也离不开市场动力	34
胡伟星，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	



港资本市场成熟，金融服务优势明显。所以，在互联互通的机制下，大湾区比较容易形成金融创新的集成优势，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投融资和成长平台，帮助企业走出去，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持续迈进。

目前，香港已经成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市场上的人民币投资产品的种类也正在增加。因此，大湾区内的创新资本将拥有更多的向外扩容的路径，香港也可以更好地满足区内离岸人民币的结算融资和资金管理需要。

未来应进一步培育粤港澳金融合作平台，扩大内地和港澳金融市场要素双向开放和连通，打造引领泛珠三角、辐射东南亚，也服务于“一带一路”的金融枢纽。

第四个问题，虽然大湾区的建设具有非常好的潜在发展动力，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不应该被低估。

首先，在“一国两制”下，大湾区建设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大湾区内的港澳和广东的 9 个城市在制度、文化和企业运作等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和凝聚共识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强政策和规划的协调对接，将两种制度、体制的互补性收益最大化，把差异性成本最小化，是湾区融合在制度上非常关键的挑战。

其次，大湾区要素流动应该跨上新的台阶。大湾区建设必须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更加

自由地流动，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取向的优化配置。例如目前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通关制度能否有所创新，以便达到提高交通效率，使人流物流能够达到最优。

再次，要充分发挥互补的比较优势。粤港澳经济各有优势，如何在各自优势的领域里发挥引领作用。大湾区不同地区、不同实体应对自身的比较优势，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以减少地区部门利益的惯性思维，勇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通过加强沟通和协作，寻求发展互补和协同效益，争取实现共赢和多赢。

最后，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大湾区相关各级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改变传统的优惠政策“一事一议”的旧有模式。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而且跟大湾区建设相关的各项政策应该具有前瞻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尽量采取中性政策，防止频繁的朝令夕改，从而实现资源配置以市场化为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

总而言之，大湾区建设的提出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战略举措，但是仅仅有构想和潜能是不够的，不解决实际中发生的问题，大湾区的建设就不可能有序成功地进行，这些方面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也不应该被低估。

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 梁锦松 / 南丰集团行政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



梁锦松

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虽然是 2015 年提出的，但是香港在此之前就一直在思考怎样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进一步合作融合。

内地与香港的体制与文化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个差异就是内地几十年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功，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和领导，香港的成功有政府的努力但主要还是因为市场是比较成功的。简而言之，内地的成功是政府的作用，香港的成功是市场的作用。做生意的经常说，竞争要看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长项。那么香港的长项究竟有什么。香港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聚才（财），既要聚人才也要聚钱财，而人才远比钱财重要。所以我觉得在大湾区建设中，吸引人才和融资是香港最重要的两个贡献。

第一，要培养、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但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是中国人。美国之所以这样强，就是因为把全球很多优秀人才吸收到了美国。香港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首先，实行“一国两制”，以及法治、自由和低税。其次，香港的生活方式比较国际化、比较开放，是个非常多元的社会。最后，

香港是一个工作生活非常方便、安全的地方，而且教育、医疗也都比较发达。

我举个例子，三藩市的旁边就是硅谷办公区，两地相距大概 45 分钟左右车程。谷歌 40% 的员工不是住在硅谷，而是住在相邻的三藩市。谷歌员工为什么不选择住在硅谷？因为他们觉得三藩市有比较开放自由舒适的环境，而且可以跟不同行业的人才交往。香港到深圳也差不多是 45 分钟车程，可以效仿硅谷和三藩市。

第二，香港可以提供资金。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每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美国是纽约，欧洲是伦敦，亚洲是香港。香港有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国内、国际两个资金池，怎么样融通，怎么风险管控，是香港做金融中心最好的机会。所以聚才与聚财，人才中心与金融中心，这两个是香港的强项，也是在大湾区建设中香港最能够给予助力的两个领域。

当然有了人才之后，还要有发展的行业。纽约与伦敦的创意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香港可能也应该跟周边地区，特别是深圳、广州，发展两个行业。一个是生物科技，包括制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在这方面，香港也有优势，因为香港有两个世界顶级的医学院，而且有很多科学家。但是因为香港比较小，所以临床、市场都比较小，而内地幅员辽阔、有 13 亿人口，发展生物科技大有可为。另一个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现在全球 IT、AI、生物科技三个行业融合发展。我预测未来 10~20 年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三个行业的融合发展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甚至会带来社会巨变。

关于粤港澳协同发展，首先是要素的流动，人、货物、服务、资金、信息，怎么样能更顺畅地流通？特别是在人才方面。比如能不能给进出香港、内地的人才开辟绿色通道？不用排队，而且能突破 183 天税务的限制。现在我们到内地开会，都是数着日子，因为一超过 183 天就要按照内地规定交税，内地与香港个税比是 45：15，高很多。

其次，我建议组建各个行业的专家组，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出谋划策。比如生物科技应该怎么样推动，大



数据怎么样推动，金融怎么样分工合作等等，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机制来研究下一步怎么走。

再次，我觉得应该重点研究怎么样培养、吸引人才。因为相对华东、华北地区，华南地区在培养人才方面还是相对逊色的。粤港澳大湾区比世界其他三个湾区著名高校少很多，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大湾区只有4所，大部分还是在香港。怎么样利用香港的优势，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推动国家的研究院在大湾区落地合作，特别是合作培养人才我认为很有必要，因为没有人才很难发展创新经济。

最后,我要提的是协调推进。现在大湾区有两个特区、三个海关的关税区,文化、体制也不相同,怎么样来协调。现在发改委在做相关规划,但是发改委来领头协调推进,我觉得高度可能还不够。除了各地政府的协调之外,能不能像以前写基本法的时候,除了有起草委员会,还有各行各业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就是既有官方组织也有民间专家,由中央领导协调做决定,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思路。

吸取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 经验和教训，全力推进大湾区建设

■ 钮小鹏 / 美国史带金融财团全球合伙人、史带战略控股集团总裁/CEO



钮小鹏

我首先从美国商界的角度看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参考借鉴。

第一，美国的两个著名湾区分别享有东岸和西岸的优势，服务业在两个湾区占据非常大的比重，达到 80% ~ 85%。两个湾区的实体经济也发展得非常好，是通过大幅度提升服务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范例。

第二,美国湾区的人才除了源自本土优秀大学,有很多激励机制之外,与美国的移民政策也密不可分,而且这不是其他地区或者国家短期内可以复制的。但是其在人才引入,尤其是在高端人才引入方面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大湾区研究学习。

第三，法律以及制度的完善，这是两个紧密相关的话题，其在中美经贸关系博弈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世界上一些地区性经济体成功的主要基石。

第四，美国两个湾区的差异化。东岸的纽约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世界第一大经济中心纽约。西岸的旧金山湾区，特点就是硅谷和高科技。所以服务业占比高、优秀人才聚集、法律制度完善等是美国这两个湾区最具特色的地方，值得大湾区学习。

美国的湾区存在哪些问题？第一，大家可能都知道华尔

街和硅谷，但是从营商环境评判，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一直是美国最差的五个州之二，而且税收特别高。第二，政策非常不稳定。第三，整体生活成本比较高。第四，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金融监管，尤其是纽约湾区的监管越来越严格，抑制了当地的创新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五，湾区激励机制不够清晰完善，处于吃老本乏创新状态。综上所述，美国两个湾区已经在过去大概四五年的时间里，把一些竞争优势拱手让给了中西部和南方的内陆地区。美国湾区存在的问题值得中国大湾区在建设过程中引以为戒。

综上所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的两个核心湾区既有优势也有问题。中国大湾区建设也有很多独特优势，尤其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率，如果结合西方的市场经济，将形成优势互补。关于大湾区建设我有以下三个建议：

第一，大湾区建设必须要有一个明确主打的东西。最近中国在金融领域有一些进一步开放的举措，涉及证券、资管、保险、理财等行业。大湾区有没有可能在开放的宏观政策里面拿到一块？代表国家先行先试，这是西方企业和政府语境里能够听懂的一个指引。

第二，建议大湾区在考虑引进来的同时，也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我有幸在过去三四年带了八位美国州长到中国访问，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美国的州长非常惊讶中国的发展。我也带过不少世界财富五百强的企业到中国选址，在此过程中我明显感到中国的招商引资过程是单向的，其实用走出去的方式能更好地引进来。如果不进行走出去、引进来双向互动，在招商方面将有一定难度，效果不会很好。

第三点，从美国商界的角度讲，已经与“一带一路”失之交臂。首先，美国政府退出 TPP，丧失了亚太地区的主动权。其次，目前美国政府层面并没有明确参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最新版图也不包括北美，但是美国有很多企业非常期盼能参与“一带一路”。如果大湾区能有效利用市场和资本的手段，把美国的资金和企业引入大湾区，对中美两个国家的商业利益和资本运作都是好事情。

利用耐心资本为 粤港澳大湾区筹资

■ 王燕 / 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



王燕

粤港澳三个地区可以优势互补。香港和澳门在服务出口方面有巨大的比较优势，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服务贸易方面世界排序比较低。如果贸易、服务业不够发达，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不够发达，法律、商业服务、ICT 服务等等比较落后，就会对制造业造成一些阻碍。所以，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可以和香港、澳门互相学习，推动服务业和贸易的发展。

以上不是我发言的重点，我重点要谈的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项目——怎么样利用耐心资本来为大湾区筹资。这项新研究也适用于“一带一路”的筹资问题。

耐心资本就是长期投资资本，耐心资本培育的关系就是合作伙伴关系，在这种伙伴关系里，投资人和被投资的对象——公司、地区或国家，形成了伙伴关系。耐

心资本着眼的是长期发展，比如“一带一路”投资一个国家，着眼的是这个国家 10 年甚至 20 年的发展，不是着眼于短期内的利润。所以，耐心资本着眼于长期的互利共赢关系。

荷兰一个学者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凡是有儒家传统的国家都具有长期投资的喜好，因此有大量的长期储蓄。他们的投资行为有点像股权投资，而且他们愿意进行实业投资，包括 PEcapital、风投，丝路基金也是一种股权投资，它们比较能够承担风险。

用净境外资产标志来衡量一下耐心资本或者叫长期资本、超长期的资本，可以看到新加坡、德国、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都有长期投资的趋势，他们的净国外资产是比较高的。

持有耐心资本的证据是什么？主要是看外商直接投资的纯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数据。我们计算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投资，用对外投资减去对内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看到对外投资超过了对内投资。第二个证据就是中国在跨国并购方面已经逐渐领先，从 2007 年以后一直是上升的，而且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一个国家有长期投资，不一定就有耐心资本，耐心资本需要特殊的金融机构把它动员起来并投入实体经济。哪些机构拥有耐心资本呢？比如多边发展银行，他们的贷款很多都是 10 年、20 年以上的。还有就是国家开发银行。最近召开的联合国贸发组织会议专门讲了开发银行融资，大力鼓励各个国家成立更多的国家开发银行。我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大湾区开发银行，把耐心资本动员起来进行长期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实业实务等等，以加强大湾区的一体化。

比如欧洲投资银行成立于 1958 年，成立后主要投资于欧洲一些落后地区，增强了欧洲内部的一体化趋

我要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有助于世界各国参与投资、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平台。大湾区也可以做成一个平台，吸引各个国家把投资银行建立起来，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市都可以参加，做成一个能够达到多赢的投资平台。



势，因为是跨国的、多边开发银行，所以增强了不同国家一体化的动力。

世界银行最近有一个新动向——建立了一个新的 Pubic money，用官方发展援助基金投资于私营企业的股权。

我想介绍一下南非的经验。南非有一个开发性金融机构——工业发展公司，成立于 1940 年，它的目标是做一个非营利机构，注重于工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帮助地区经济整合、创造就业机会等等。它专门做股权投资，不像世界银行主要做贷款。南非这家工业发展公司是百分之百国家所有，现在已经投资 18 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员工 839 人，它经营得非常稳健、自负盈亏。1940 年成立以来，没有太多的国家持续补助，没有垄断，目前共有 8 个国家开发银行机构。它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起到了反周期的作用，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最后，我要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有助于世界各国参与投资、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平台。大湾区也可以做成一个平台，吸引各个国家把投资银行建立起来，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市都可以参加，做成一个能够达到多赢的投资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四个问题

■ 夏乐 / 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夏乐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有很多优势，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我的发言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第一，竞争模式的问题。过去 30 多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其中有很多成功经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比如珠三角地区，除了分工协作，内部竞争也非常激烈，有广州、深圳之间的竞争，也有省港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形成了珠三角地区今天经济繁荣的局面。如果我们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意味着要对这种地区竞争的局面有所修正。我觉得这就存在着一些平衡的问题。比如最近在广州和深圳建机场的问题，两地的民众有不同的意见。更长远来讲，香港和深圳哪个要建成金融中心？哪个来带头，也存在一些争论。大湾区进行长远规划和建设，是否应该由上级政府来决定，这个城市你有这样的优势，你来做这个；那个城市有那样的优势，你去做那个。而不再像以前，增加地区间内部竞争呢？我的建议是在大湾区的建设上，要把公共基础设施做到联通、统一，在此基础上，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还是应该允许它们有一定的竞争，特别是在创新方面。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未

来的创新会出现在哪里，我们也永远不知道创新企业喜欢在哪里。但只要在大湾区内，我们的整体计划就是成功的。所以我认为未来大湾区的建设、发展模式依然要保留一定的竞争和开放，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让市场机制决定的过程。

第二，信息流动的问题。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国际信息之间的流动发展特别快。2015 年到 2016 上半年，国际贸易是零增长，这是全球化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问题。当时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全球化的终结？有些研究机构发现，尽管货物贸易零增长，但是数据信息的跨界流动增长非常快，远远超过了当时 GDP 的增长。香港要在金融服务、大数据、AI 等领域为大湾区建设做出贡献，离不开信息的流动。内地的科研、人才教育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从外边吸收大量的信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大湾区内很多信息流动是有阻碍的。比如，我们研究机构的教授们上网交流，在国内最大的抱怨就是没办法上谷歌。所以，在建设大湾区的过程中，应重视信息要素的跨区、跨界流动。可以在科研院校进行更多的开放。

第三，人才问题。现在香港房子限购，内地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江门等城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限购。房子的限购影响了人才落户大湾区。当然高端人才或高收入人群可以在深圳置业，但是很多中层的人才，他们才是企业运营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果他们到了一定年纪没办法在这边安居，大湾区对这类人才就会失去吸引力。所以，要想留住人才，房地产是很重要的问题。如何把房价降下来？当然高房价有很多因素，包括目前处在全球低利率的时期，如果未来利率上升也许高房价可以有所缓解。但是至少从国内的几个超级大城市来讲，还存在可以进行调整的空间。比如，大力促进国内房屋租赁市场的发展。因为很多人买房更多是住的需求，未必需要拥有房子，所以通过发展本地的房屋租赁市场，是可以部分解决房价过高问题的。还有就是国内建设用地指标的问题，大湾区内是不是可以在土地建设指标上进行一下相互调剂？能不能向大湾区以外的地区，通过市



场化的手段购买，或进行补贴，解决大湾区内建设用地的的问题。我认为只有把房地产问题解决了，才能更好地留住人才，当然香港的房地产问题可能解决的困难更大。

第四，贫富差距问题。大湾区发展是国家战略，所以大湾区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要能够被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最贫困、最弱势的群体共同分享。如果大湾区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只能被一部分人，哪怕是多数人拿走，

导致一小部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我觉得这也是对大湾区战略的重大挑战。如果大湾区发展建设不重视贫富差距问题，大湾区战略就不能说是成功的。而且贫富差距问题，我相信不单单是在香港、澳门，在国内也一样。大湾区的发展战略应该更具有包容性，既要让高端人才留得住，也要让劳动技能没有那么高的人才，能够在大湾区里留下来。

大湾区发展是国家战略，所以大湾区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要能够被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最贫困、最弱势的群体共同分享。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既需要顶层设计，也离不开市场动力

■ 胡伟星 /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



胡伟星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国家战略，各级政府都给予了极大重视。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且必要，顶层设计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可以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合作，但是只有顶层设计也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回顾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可以看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线索，就是它的合作在过去 30 多年基本是市场推动的。

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大湾区今后的成功取决于比较有效的顶层设计以及市场动力。道理其实很简单，全球所有湾区的建设发展都是通过市场竞争带来的强劲动力。过去 30 年珠三角的发展，最初的前厂后店、来料加工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吗？不是，是市场底层动力。之后又经历了制造业、服务业的提升和有机融合，后来又有粤港澳三地合作和泛珠三角的合作。从这个发展路径来看，我们需要一个很强大

的能够发挥大湾区市场的动力，来继续推动今后大湾区的发展。

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香港的优势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在金融方面有大湾区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第二，香港的各行各业专业服务都有一定的优势；第三，香港在国际联系方面有纽带作用，跟国际发达地区有深厚的联系。

我讲的观点就是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作用应当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超级联系人只是一个中介，或者只是利用大湾区的建设去赚钱，或者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赚钱，其实并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置身于大湾区的建设之中。所以，香港仅仅做超级联系人是不够的，那只是局外人的角色。香港应该发挥的作用是积极地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进一步融入大湾区，这一点在香港回归的这几十年都没有完全达到。所以，这方面是香港社会要凝聚共识、要进一步下功夫的地方。

为什么只有香港融入参加进大湾区建设之后，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呢？这里面最基本的逻辑就是共商、共建、共享，如果没有这个“共”字，就不可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最后也不会真正受益于大湾区的发展。

谈到共商、共建、共享，关键是要达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如果我们从五通的角度来看，设施连通，现在高铁快有了，港珠澳大桥也快建成了，过境的设施交通便利也大大提高了，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在政策沟通方面还非常不够，很多政策问题限制了人才流动。大湾区有这么多的自贸区，政策不相通，就没有办法共建。还有房地产政策等很多都需要政府进一步打开政策的一些关卡，做到政策沟通。最后一个，民心相通其实是最

香港的优势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在金融方面有大湾区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第二，香港的各行各业专业服务都有一定的优势；第三，香港在国际联系方面有纽带作用，跟国际发达地区有深厚的联系。



难的。我在香港 20 年，我通过亲身体验，感觉在五通里面，民心相通是大大落后于其他几通的。

所以，综合上述内容，我的建议有两条：

第一，我建议大湾区建设要开始从务虚到务实了，要减少纸上谈兵，要多想一想怎么落实的问题。希望两个特区和九个城市以及广东省各部门领导能切切实实地谈政策沟通，能够确实谈成一些落地项目，这才是实实在在对大湾区建设的推动。比如大湾区那么多港口，如何协调出一个比较有效的机制，增加运力、减少冲突。再比如，五个机场怎么协调、安排。

第二，民心相通是最重要的，是大湾区最终能不能建设成功的关键。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下建设的，所以民心相通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大湾区就不可能真正建设好。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要全面推进内地和港澳互利合作，完善方便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举措。其中有句话非常重要，即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爱国精神，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荣光。这句话实际上讲的就是民心相通，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大湾区就搞不好。

“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 于洪君 / 国际金融论坛(IFF)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于洪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在国内，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在国际上，“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奏；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一带一路”不是要代替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在现有的区域性、全球性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更多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一带一路”是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古代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更是友谊之路，它的主要精神特征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建、互利共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古丝绸之路的精神，把中国的发展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

四年来，中国国内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从中

央到地方，从企业到各种文化团体乃至智库都非常活跃。国际上也是这样，很多国家都成立了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的评价越来越高。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累计投资超过了500多亿美元，为相关国家建造了18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11亿美元的税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2014年达到了3万亿，在全球贸易萎缩的大背景下，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一倍。所以“一带一路”北京峰会，可以说是一个新起点，在四年来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在会议期间，形成了5大类、276项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或组织跟中国政府签署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携手周边各国共同发展的新举措，是国际社会共同抵御保守主义和封闭主义，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新路径。

下面谈谈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大湾区是后来居上，有巨大的后发优势，发展前景十分可观。中国政府做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决策，是基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大湾区的城市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积淀较好、站位较高，这个地区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本，聚集了大量人才，掌握了很多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对外开放的方式和资源。所以，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前景甚至可能超过世界其他主要湾区。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意志、是民族的共同行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该纳入“一带一路”当中来。

第一，我建议粤港澳三地地方政府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发改委以及相关部委配合支持下，制定出统一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行动纲要。第二，粤港澳地区企业文化事业单位、科研教学机构以及大众传媒要广泛深

世界大湾区建设（2）

“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于洪君，国际金融论坛 (IFF) 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要以超前的战略理念规划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

姚培生，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

中葡合作发展基金助力澳门抓住机遇，全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金光泽，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管理公司总裁

以建设大湾区为载体，促进“一带一路”稳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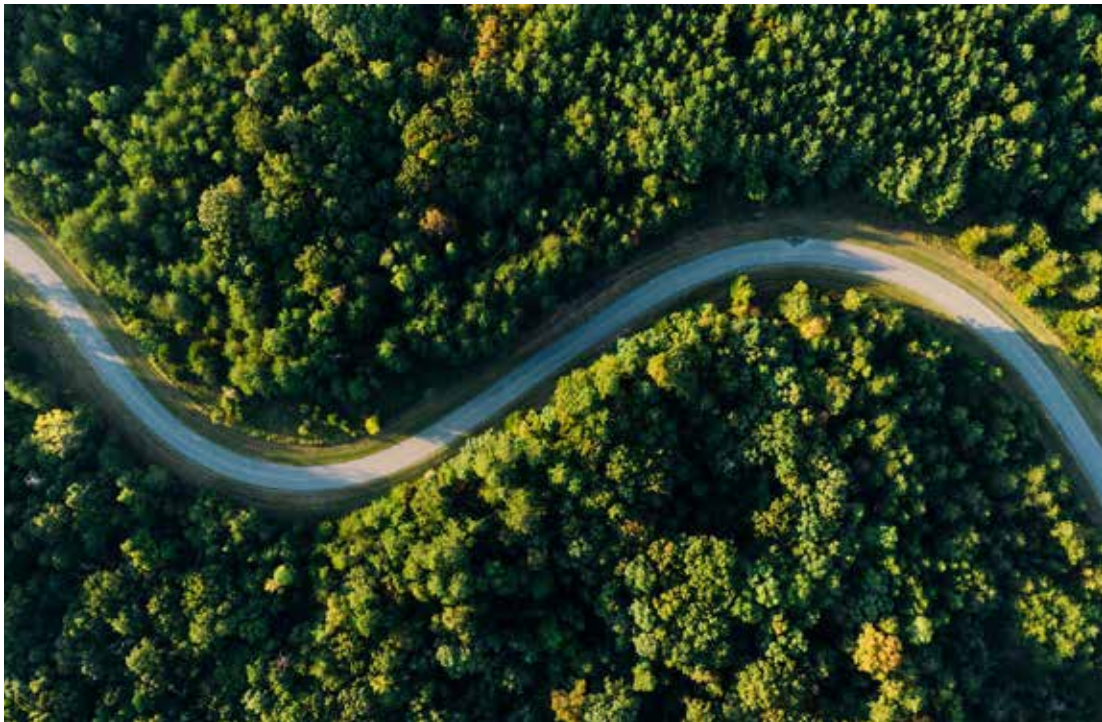
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37

39

40

42



入加强交流、协作和对话，要在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做大、做足文章。第三，粤港澳三个地方要互联互通，如果做不到真正的互联互通，港珠澳大桥建得再好也没有意义。粤港澳要建立完善的三地适用的体制机制以及三地统一的各种标准，使互联互通在三地之间变为现实，这样才能够使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发挥实效，为后来的发展积淀力量。通过紧密的协调、沟通、合作，使粤港澳三个地区形成紧密的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使粤港澳成为背靠中国内陆、立足珠三角、面向东南亚、辐射全世界、引领互利共赢、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动力源；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各个领域协调发展、健康发展、稳步发展的新引擎；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各个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城市、周边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个示范区。

要以超前的战略理念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

■ 姚培生 / 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



姚培生

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旧金山、纽约、东京湾区各有其优势，但这三个港湾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不应该照搬它们的模式。我认为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成为凝聚创新的新城市群，不应该成为吃喝玩乐者的天堂。我认为应该以超前 30 ~ 50 年的理念来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

就此我主要谈三点：

第一，大湾区要有新的定位，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高速通道，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也必将改变未来。30 ~ 50 年以后什么样子？现在很难说，但应该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巨变时代。我认为目前的生产方式已经对我们生存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而且破坏造成的后果是很难消除的。现在用油、用煤产生大量碳排放的生产方式，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能看到被彻底改变。

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城市病”，北京为什么疏解？就是因为“城市病”越来越厉害了，而目前的生产方式是“城市病”的根源。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我希望不

要再出现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我建议大湾区不要再建设新的传统大超市，应该把大湾区建设成为中国的硅谷和未来世界的硅谷。

第二，我建议要有一个新制度使大湾区成为一个崭新的特区，香港、澳门的优势对于新特区的启动发展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但香港、澳门的市场制度与广东的制度有很大差别，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三地政府、专家在制度创新、制度对接方面，应该有创新的理念，要解放思想，否则未来的大湾区不可能按预想得到发展。大湾区这个特区，不是原来建设特区的概念，这个特区是一个崭新的、世界独一无二的特区，因为旧金山、东京湾、纽约这些地方注重经济制度，我们可以借鉴，但绝不可照搬。我认为要将香港、澳门跟广东的优势叠加起来，把劣势消除。

第三，我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兼听则明，要多听听国内外相关专家的意见，减少决策失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项动态的、系统性大工程，根据未来的大目标分阶段实施。我刚才说世界三大港湾是旧时代的产物，并不是要把它们全盘否定，既然能成为世界最发达的湾区，一定有其可以学习的经验，但不要盲目崇拜照搬照抄。比如，楼宇建设也要超前，我认为摩天大楼既浪费资源又不安全，特别是不环保，摩天大楼用的是中央空调，中央空调非常不干净，未来建楼也要考虑环境保护问题。另外，我认为未来的大湾区不是靠外贸和表面的繁荣吸引人，而是要靠内在魅力吸引国内外的人才。

最后我建议媒体大力宣传粤港澳大湾区，要在国内国际媒体上广泛、大力宣传。总之大湾区建设起步一定要好，一定要在媒体的宣传下、舆论的监督下进行，要让更多人了解、关心大湾区建设而不只是部分专家、学者、官员和当地人了解关注。

中葡合作发展基金助力澳门抓住机遇，全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 金光泽 / 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管理公司总裁



金光泽

中非发展基金是中国第一支对外合作的主权合作基金，设立的主要目的是鼓励、支持更多的企业到非洲开展务实的投资合作，也就是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先锋先导作用来促进投融资合作和产业发展。中非发展基金作为对非投资合作的综合性投融资服务平台，已经投资了一批有影响、助发展和促民生的项目，也得到了多位中国领导人和多个非洲国家政府首脑的赞扬，有力地巩固和深化了中非友好务实合作。正是因为如此，在 2015 年 12 月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对中非发展基金新增 50 亿美元，使中非发展基金总规模达到 100 亿美元。

截至目前，中非发展基金已经对非洲 36 个国家 91 个项目进行了投资，承诺投资额达到 45 亿美元，项目涉及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农业民生领域和资源开发等等。这些项目全部建成之后可以带动对非投资 200 多亿美元。从 2007 年设立到 2017 年初，在中非发展基金成立的十年间，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存量从不到 45 亿美元发展到 2017 年的 400 亿美元，中非发展基金在促进中国对非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2013 年开始，中非发展基金管

理着 10 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发展基金，包括澳门，中葡合作发展基金这个平台是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澳门特区政府共同设立的，运作 4 年来先后与近百家企业探讨合作，在非洲的葡语国家、安哥拉以及巴西投资了一批项目，主要涉及基础设施、现代农业化、制造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应该说对促进中国和葡语之间的国家合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从实践工作的角度谈几点想法和建议：

第一，建议未来国际金融论坛（IFF）能够关注和推动非洲金融体系建设和非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因为非洲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非洲有 10 多亿人口，是全球最年轻、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全球面临的危机之一就是增长缺乏动力，我们也在不断寻求新的增长引擎和增长动力。非洲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一直没能成为内生的发展动力，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其潜力是确实存在的。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得益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非洲因为它的资源禀赋，经历了一段资源所带动的快速增长期，但这样的增长内生动力是不足的。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非洲国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面临债务快速增长、外汇短缺、货币贬值等挑战。亟需寻找好的发展路径，把发展潜力能够变成真正的内生发展动力。非洲这样的一个人具有 10 多亿人口的大陆一旦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将会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目前非洲金融体系还处在初步的发展阶段，资金非常有限，治理架构也比较脆弱，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具有的优势是过去 30 年经济持续发展逐步形成的，这些宝贵的发展经验对非洲的建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处在并不完全统一的市场中，加上制度差异，所以如何突破制度差异，建设一个三地融合且能有效促进要素流通的市场，是大湾区建设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非洲有 10 多亿人口，是个非常大的市场，但非洲又是分割的，有 54 个国家，基础设施互相没有连通，政策差异也很大。所以大湾区建设面临的挑战，非洲在建设



发展中也会同样遇到。因此，大湾区在克服挑战中得到的宝贵经验，对非洲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我们在做中葡合作发展基金过程中，与澳门有比较密切联系。我们将尽己所能促进发挥澳门独特优势和作用，助力大湾区建设。大湾区建设中，广州应发挥领头羊作用，其他 10 个城市也要各尽所能、协同发展。澳门是世界的旅游休闲中心，具有独特的风土人情，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澳门正在构建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平台和纽带，这也是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的动因之一。葡语国家虽然不多，但都是连接海岸线的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因为历史、语言和文化原因，可以成为大湾区与葡语国家联系的纽带，在促进葡语国家与大湾区投融资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澳门特区政府也将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第三，作为一个开发性基金，我们在政策的引导下，进行市场化运作。我们一直希望能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作为跨境投资基金，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携手企业助力其成功跨境发展。我们也希望企业能顺应投资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势，寻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因为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往往是因为没有正确评估其所投资目的地产业发展的趋势，有的可能是过于超前了。我们愿意助力那些有前瞻性、有决心的企业进行跨境海外投资，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和挑战。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政策的沟通特别重要，这也是“一

带一路”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五通之一。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因为我们和企业共同做着一件件特别具体的事情，所以对具体政策在实操中的影响和作用有着非常直接的体会，包括外汇管制、汇率波动、关税以及产业等等政策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政府机构能拨冗听取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对投资环境的体会是第一手的，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促进要素流动、完善投资环境。粤港澳大湾区的要素流动现在不是完全自由畅通的，促进要素高效自由流动，需要政策制定者、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

以建设大湾区为载体， 促进“一带一路”稳健发展

■ 胡必亮 /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胡必亮

“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是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大湾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当然不是唯一载体，但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把大湾区这个载体建设好了，会大力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

就这个问题，我想谈三点自己的看法：

“一带一路”，大家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未必了解它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所以我们叫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强调五个方面的联系：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方面，所有的联系都要构建得更加紧密，这就是“一带一路”最核心的内容。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需要有很多载体把它

落实下去，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就是建设大湾区。因为世界三大湾区的建设发展已经证明了，它们是跟世界进行联通的有效形式。尽管纽约湾区建设不提“一带一路”，但是通过华尔街在全球建立了最好的资金融通渠道。华尔街有全世界最好的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金融机构三四万家都落户在曼哈顿。所以纽约湾区把全球最好的资金融通的渠道建立起来了。旧金山湾区，把全球最好的科学和技术联通起来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全球科学技术联通方面，旧金山湾区是做得最好的。东京湾区则是在全球制造业方面联通最好的地区。当然，除了最好的方面之外，以上三个湾区在其他方面也做得不错，比如东京、纽约的港口就建设得很好。

中国有几个地方都具有建设湾区的基础，其中粤港澳当然是最成熟的，但长三角的杭州、上海的条件也不错；环渤海湾的大连和京津冀条件也挺好；北部湾与越南

靠近的广西一带也具备建设湾区的条件。粤港澳这个地区毫无疑问，与刚才讲的几个地区相比，最具有建设大湾区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与世界其他三个著名湾区相比，将更加辉煌的、更加美好。因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载体出现的，而“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走出去迈向开放的重要一步。

第三，“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建设互相依托、互相支撑，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认为其中三件事情更重要：

一是要建立一个联动的开放体系。“一带一路”的本质就是要联通世界，就是要开放，所以大湾区建设必须摒弃传统封闭的思维模式。大湾区是 9+2，是“一国



两制”，涉及不同制度、不同利益主体。所以要更加联通世界，要更加开放。资本市场可以更大幅度地开放，可以让外资的基金和银行占更大股份。更重要的是汇率和资本管制的开放，让汇率逐渐由市场的力量决定，要开放金融体制、汇率管理方式。我强调联动的开放，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只在个别领域开放，别的领域不开放是没有用的。

二是联动的协调。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城市间的协调很重要，大湾区与世界其他湾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协调也很重要。协调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很多是区域性問題。有些城市为了搞好协调成立了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有实权还是没有实权？没有实权啥也管不了，有太多实权又可能管死了。

三是人才。大湾区建设要取得成功，一定要有好的政策和措施吸收到世界上最好的人才。纽约、硅谷、东京发展成功都是因为吸引到了大量的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吸引到中国最好的人才，还要吸引到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才能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方面是我们的短板，比如人才管理政策、体制方面的制约和限制。我们应该加大改革的步伐，要比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的人才政策更好，否则不可能争取到世界优秀人才的加入。

从数据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

■ 马克·麦朴思（Mark Mobius）/ 邓普顿新兴市场集团执行主席、新兴市场教父



马克·麦朴思（Mark Mobius）

1987 年第一支新兴市场基金约有 1 亿美元，只在墨西哥、香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进行了投资。现在新兴市场基金约有 290 亿美元，投入世界超过 70 多个市场，其中很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新兴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1987 年股票市场的市值大概是 27.2 亿美元的规模，现在已经是 19 万亿美元的规模。现在全球总贸易额的 40% 以上，都来自新兴市场。另外，过去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很少，可是现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 7 万亿外汇储备里面，有 3 万亿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新兴市场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在下降，但是发达国家却在增长。新兴市场私营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例。

另外，新兴市场仍在不断快速增长，IMF《世界经

济展望》报告预计 2017 年底，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率为 4.6%，发达市场经济增长率只有 1.8%；中国 GDP 增长率保持 6%，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2010 年中国 GDP 增速 10%，2017 年增速在 6% 左右，尽管看起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在下滑，但是实际上以美元计价的话仍然是在增长的。

再来看一下人口结构、人口红利，新兴市场人口平均年龄是 32 岁，发达国家是 41 岁，前沿市场只有 24 ~ 25 岁左右。另外，新兴市场人口共 59 亿，中国和印度各有十几亿人口而发达国家的人口只有 14 亿，所以新兴市场是巨大的。

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在升值，比如俄罗斯、巴西的货币都在走强。还有一些国家的货币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讲，其币值是被低估的。比如人民币、雷亚尔（巴西货币）和韩元都是被低估的。这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美元和欧元的资产愿意来这些市场投资。

看一下大宗商品的价格。原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大宗商品价格在持续上涨，这几年从价值的角度来讲，中国进口少了一些，但是从绝对量上来说，中国在不断增加石油的进口。因为大宗商品也是“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一环。

新兴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从全球互联网的使用情况看，中国目前占比达到 21%，是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印度占比 14%，中国和印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

超过了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在 2008 年、2009 年，全球智能手机总销售量大概有 2 亿部，大多数都是在发达国家使用；现在全球有 10 亿部智能手机，其中有 70% 以上都销往了新兴市场国家。2016 年中国“双十一”阿里巴巴平台总交易额达到 1200 多亿，2017 年“双十一”的交易额更

世界大湾区建设(3)

从数据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

马克·麦朴思（Mark Mobius），邓普顿新兴市场集团执行主席、新兴市场教父

45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创新发展思考

陈宣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司原巡视员

47

大湾区发展的新动力及未来格局

邢自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49

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以及未来的重要战略举措

余利明，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51

从城市群发展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

赵晓斌，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52



是达到了 1600 多亿。这还只是中国这一个新兴市场“双十一”一天达到的网络交易规模。全球线上支付蓬勃发展，现在约有 4 亿多人在使用线上支付，包括手机支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发展，将会对未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接下来看一下资金的流动情况。股票市场，新兴市场股市的发展情况非常好。最近有非常多新的资金涌入新兴市场，我们认为这个趋势在接下来五年还将继续。因为从 1987 年以来，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此外，我们看一下新兴市场熊市和牛市的周期。新兴市场熊市的周期比较短，平均来讲，增长率超过 300% 的牛市，总月数达到 69 个月，而跌幅超过 50% 的熊市只有 15 个月，也就是说牛市时间多于熊市，牛市比熊市的周期长，增长幅度高于熊市下跌的幅度。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创新发展思考

■ 陈宣庆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司原巡视员



陈宣庆

中国政府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长远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并且已经纳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加以推进。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充分发挥广东、香港和澳门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制度多样性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中寻求一致性。以合作发展为主题，以创新发展为主线，突出合作重点，共同务实推进。

当前，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展，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快创新的步伐：

一、创新合作平台

合作平台是促进粤港澳合作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新的形势下，按照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的总体要求，应统筹推进大湾区内区域合作平台建设。

一是积极推进自贸片区在大湾区内扩区，争取更多的平台、更多的区域享受自贸区政策，发挥南沙等新区港口空间政策的集合优势，建设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枢纽，面向世界开展高水平的合作。应在总结已有的粤港澳三大合作平台、三个自贸试验区——前海、南沙和横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布局和可行性，尽快形成以自由贸易港区为先导，以自贸区片区为主体，以各类功能园区为基础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二是以联动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原则，统筹大湾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产业平台建设。通过资源互补、联合出资、项目合作、技术支持等方式参与产业平台合作，探索建立相互匹配的利益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尽快打造参与国际竞争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大产业合作平台。

三是合作建设国际基础科学和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体系建设，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提供重要的支撑。

二、创新合作机制

加快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完善跨境基础设施协调机制和跨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相互开放，完善跨境口岸管

理机制。二是完善大湾区科技创新，探索建立大湾区科技创新联席会议协调机制，建立适应大湾区的创新人才发展制度，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合作。三是构建维护区域金融安全新机制，加强大湾区金融法律法规的衔接，密切粤港澳司法合作，

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跨境保护机制，建立跨部门、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业务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粤港澳反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充分发挥广东、香港和澳门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制度多样性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中寻求一致性。以合作发展为主题，以创新发展为主线，突出合作重点，共同务实推进。



洗钱、反恐融资和反偷税工作机制，建立系统性风险防控体系。四是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流动人口监视和预警机制，完善跨境陆路交通合作和跨境沿海管理协作机制，构建一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五是建立低碳发展合作机制，三地共建大湾区低碳发展示范工程，加快形成大湾区绿色经济体系。

三、创新合作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重点是那些各方都密切关注且有迫切需要，但是单靠任何一方都难以解决的重大项目。一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三网一中心”。二是积极建设以香港国际航运中心为核心，以深圳、广州港为集装箱枢纽港的枢纽航运中心。三是治理产业合作重大计划和重大科技专项实施，重点聚焦约束粤港澳大湾区的全球关键技术，抢占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四是支持粤港澳共建金融圈，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优势，支持广州着力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发挥深圳创投制度的优势，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打造国际化金融创新中心。发挥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桥梁的优势。

四、创新合作政策

港澳与内地不同的行政、社会经济管理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理念认知差异是影响各方深度合作的重要原

因，要实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城市群的目标，必须构建促进各方互利共赢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特别是强化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一是应该在统筹粤港澳各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尽快由中央政府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规划，明确合作方向、重点目标、定位和主要任务，制定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流动，建立统一市场，推动社会治理，便利人员流动，发展资金保障等具体政策措施。二是应设立中央政府领导牵头的高层次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合作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三是粤港澳三方应摒弃单向思维，完善协商对话机制，加强规划衔接，建立工作机制，在中央政府的指导协调下，形成合力，加快迈入世界一流湾区和一流城市群行列。为扩大中国重要的区域增长级，为促进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为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作出贡献。

大湾区发展的新动力及未来格局

■ 邢自强 /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邢自强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消费的新趋势。消费越来越多由城市群里的中小城市拉动，而不是由中心一线城市拉动。从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小城市新增人口已占每年全国城镇新增人口的 80%，而五年前只占约 50%。中小城市比较快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不断涌现的新就业机会和工资增长是主要原因。最近几年随着基建、互联互通的发展，以及高铁的进步，很多企业不断把其产业布局扩展到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和中小城市，从而带动了当地就业机

会和工资增长，吸引了人口聚集。以广东为例，广东省中小城市现在的平均人口已经有 200 多万了。这是什么概念？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才有 110 万人口。人口的增长提振了当地的消费。估计未来 10 ~ 15 年，中国的消费量级将会从 4.9 万亿美元上升到 11.8 万亿美元。

第二，投资的新趋势。中国这一轮经济复苏，从零增长恢复到 6% ~ 7%，私营部门的投资趋稳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投资的趋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不再聚焦买地、建厂，而是主要聚焦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换代，其中广东独占鳌头。首先，广东是民营经济非常活跃的地区，其次广东的科技产业、新经济在全国独树一帜。

私营投资的新趋势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过去中国出口主要是附加值相对比较低的，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所以广东是出口大省，但并不是出口强省。但最近五年来，中国出口的含金量有巨大提高。这与投资转型，越来越倾向创新型、知识型投资有关。在这种趋势下，必然是人才和专利不断涌现。2017 年中国已经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国际第二大专利申请国。中国的国际专利有三分之二来源于广州和深圳，显示出当地在创新上的巨大潜力。因此，中国高附加值出口在全球占比从 2009 年的 8% 上升到了 2017 的 16%，已超过德国、美国和日本。

在此消费和投资宏观背景下，大湾区建设应重点在哪里发力？第一，应继续在公共资源的均等化层面发力。尤其是要大力提高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卫星城的公共资源。

最近三年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进展，比如中小城市在医院床位数、学校教育机构人数等方面，已经在迅速缩小与一线大城市之间的差距。我相信未来五到十年，这种差距还将继续缩小。

基建的互联互通，最突出的是高铁、移动互联

网和物流。高铁在短短六七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中国现在的高铁网络已经覆盖超过 100 个城市，由此带来的溢出效应是非常巨大的。广东过去在高铁和铁路方面并不是很发达，但是近几年迎头赶上，到 2020 年高铁网络将覆盖广东大部分的卫星城和中小城市。移动互联网

中国这一轮经济复苏，从零增长恢复到 6% ~ 7%，私营部门的投资趋稳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投资的趋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不再聚焦买地、建厂，而是主要聚焦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换代，其中广东独占鳌头。



从 4G 到 5G 的升级，进一步缩小了中小城市消费者在选择服务和商品等方面，与大城市广州、深圳之间的差距。物流的发展也令人惊喜，比如说随着网购和物流的进步，目前跨城快递的费用已经下降到只有九块钱一个包裹跟同城差不多了，这也有利于卫星城的消费发展。

第三，流动的新趋势。大湾区内各个城市各有优势，其中广州和香港的人才优势储备是比较大的，深圳又恰恰需要很多的人才支撑其研发和企业的创新。所以，怎样让人才的流动更加自由，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多加考虑。

应通过制定政策鼓励新经济的发展，因为新经济在大湾区建设，以及这一轮中国经济转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以创造就业和消费的贡献来讲，过去四年，受供给侧改革影响，上游传统工业行业总共减少了接近 400 万个岗位，与此同时服务业创造了 1000 多万个岗位。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像传统的钢铁行业或工程设备行业一年裁员几万人，同时新兴的服务业，一年增加十几万个岗位，完全抵消了影响。网购的发展和物流的进步，以及移动支付的便捷，突破了传统销售渠道不畅的障碍，使中小城市居民可以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居民享受到同样的商品和服务。

通过学习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的经验，加速互联互通，推动公共资源均等化和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卫星城的增长幅度将快于中心城。我们的分

析是，未来 10 ~ 15 年，大湾区的人口将增长 1800 万，到 2030 年左右，将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大湾区的发展将对中国步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以及未来的重要战略举措

■ 余利明 / 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余利明

战略新兴产业集群涉及信息交流，也涉及一些技术、货物的交流，所以它的根源在交流，与贸易相关。大湾区城市群既然是湾区，一定和海岸线、口岸有关。我们谈合作，应该在这个区域里把关键的要素组合起来进行合作。所以我想通过简单回顾历史，思考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以及未来重要的战略举措。

“广州十三行”是清朝中国唯一、世界第三大的对外通商口岸，是当时全球繁华的世界级城市。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崛起成为 20 世纪的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改革开放之后，深圳一马当先，通过内外贸易的资本积累，提高它的口岸能力和集聚百业之后，现在正在转型成为国际的创新中心，而广州一直以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闻名于世。广州港近年还以南沙港的快速发展，重振了对外通商口岸的雄风。通过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区位优势，承载着对外开放的使命。

如何以全球化、包容性的增长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支点呢？我个人认为，应不忘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初心，牢记对外通商口岸的使

命。在国际贸易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和能力非常卓越，也非常突出。以广交会为例，它是植根于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于全球的著名中国标识。但在对外通商口岸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这种内涵的载体，已经非常难识别，尽管粤港澳大湾区里面有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珠海港。2016 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合计超过了 6500 万标准箱，其中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的集装箱吞吐量都是位居世界前十，分别占第三、第五、第七位。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广交会成功运作的经验，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一个服务于全球的中国通商口岸品牌？短期内也许做不到，但只要敢想敢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把香港、深圳、广州的港口作为整体枢纽来看，粤港澳大湾区 2016 年基准集装箱吞吐量合计 62000 万标准箱，远远超过世界吞吐量第一位（37000 万标准箱）的上海港、世界吞吐量第二位（3100 万标准箱）的新加坡港，以及整合后居世界第四位（2200 万标准箱）的珠海宁波港。

把香港、深圳、广州作为一个整体的枢纽港来看待，我以为是有它内在的合理性的。首先，在 100 公里海岸线资源范围内划为一个港区，在全球和中国范围内地理跨度不算大，世界其他很多港口管理的跨度比这个大得多。其次，三个港口其实是共享华南的经济腹地。第三，尽管三个港口的体制不同，但现在都是市场化运作，香港已经是全球运作非常成功的自由港。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港口都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就国际贸易的经济性而言，三个港口统一，更有利于提高效率和协调发展。例如原来只能在香港卸下的华南箱子，可以在广州南沙卸货，既减少了手续和中转费用也节省了时间，而且也不影响香港自由港的各种贸易条件、融资条件。

综上所述，如果以广交会为鉴，把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作为一个整体的枢纽港来看待，组合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港，有它的合理性和经济性。建议将此构想纳入国家规划层面进行研究，作为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支点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从城市群发展看 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

■ 赵晓斌 /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赵晓斌

我们研究了过去六七十年，全球 70 万人口以上城市整体发展的路径和发展形态，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全球只要人口多的地方，大约四五千万人口以上，其城市发展形态大都是由一个大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发展通常是先集中力量发展一个城市，然后再带动其他城市发展。而不是一些小城市推动了当地大城市的发展。

一般一个 1 亿人口的国家，会有一个超级大城市；一个 1 ~ 2 亿人口的国家会有两个超级大城市，比如日本、巴西；3 亿以上人口的国家会有 3 个超级大城市，比如美国。当然，如果人口再多，就不是这个规律了。比如印度和中国。

在中国，城市群因为大，需要分区，按照全球发展

规律来看，中国分为三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会是三个超级大都市板块的格局。比如珠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香港，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南京、杭州，以及北方的北京、天津、雄安城市群。这三个板块还会继续壮大，因为经济实力的发展会推动其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跟世界其他主要湾区，比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美国两大湾区占据美国经济比重 14%，日本的经济更是有高达 39% 来自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占中国 GDP 的 1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远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湾区，约为东京湾区的 1/2，不足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的 1/4、1/5。虽然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与世界主要湾区还有差距，但是大湾区发展潜力大、发展速度快。因此，大湾区主要大都市及其周边的城市都有很大发展潜力。

中国的京津冀加上雄安城市群是中国方案，是行政都市群，金融发展潜力一般。长三角上海城市群可以助力大湾区发展，相辅相成。大湾区在支持私人企业、民营企业创新方面做得不错，这是大湾区生命力之所在，加上金融整套体系，包括证券、保险、风投等较齐全，已经形成了较好的金融发展环境，还有港珠澳大桥、高铁、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非常值得期待，期待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引领中国经济发展，也引领世界经济发展。

全球只要人口多的地方，大约四五千万人口以上，其城市发展形态大都是由一个大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发展通常是先集中力量发展一个城市，然后再带动其他城市发展。而不是一些小城市推动了当地大城市的发展。

世界大湾区建设（4）

加大对人类和自然的投入，是可持续发展的可靠手段和途径	54
韩升洙，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把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绿色供应链中心	55
张建宇，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主任	
建设大湾区，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56
李十中，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	
立足中国国情，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	57
李人庆，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	

加大对人类和自然的投入， 是可持续发展的可靠手段和途径

■ 韩升洙 /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中国现在已经注意到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且首次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十三五”规划。气候变化是本世纪全球最大的挑战之一，它导致全球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天气和气象不断增多，严重威胁地球生态系统。

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把全球温度上升的幅度控制在 2℃之内。需要把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控制在 2900 千兆吨，而 1870 年到 2001 年已经排放了 1200 千兆吨，目前剩下的可以排放的“碳预算”只有 1700 千兆吨。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努力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 年底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大会（COP21）上，通过了《巴黎协定》，明确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 2℃之内，并努力将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之内。但是除非我们能够深刻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否则《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是不能实现的。

我们需要深层次改善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量变到质变，从棕色增长转化为绿色增长。单纯追求 GDP 增速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所以本质上其是不可持续的。加大对人类和自然的投入，是可持续发展的可靠手段和途径。

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 2014 年发表《应对气候变化、孕育经济增长：全球新气候经济报告》指出，经济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并不是必然相互冲突。我们通常认为中短期甚至中长期的经济利益与气候行动是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低碳的绿色增长是完全能够实现的。韩国通过 20 国集团提出了绿色新政倡议，并出台了一系列绿色投资计划和相关政策，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和提高就业。我在经合组织担任主席的时候，绿色增长声明获得全票通过，这个重要文件已成为经合组织绿色增长项目的基础性文件。

另外，韩国在 2010 年建立了一个全球绿色增长机构，我从 2010 年到 2012 年有幸担任该机构的理事长。在 2012 年里约峰会上，该机构演变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组织，总部位于首尔，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增长的计划和政策支持。

能够参与设计和推广绿色增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我非常高兴参与提倡在国际金融论坛（IFF）建立一个绿色增长中心，该中心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前沿气候变化研究机构，涉及水利、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我相信，国际金融论坛（IFF）有决心、有资源、有能力推动 IFF 绿色增长中心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绿色增长重要机构。

把大湾区建设成为 世界绿色供应链中心

■ 张建宇 / 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主任



张建宇

绿色供应链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密歇根大学教授提出来的，但我认为该概念最大的发展和实践是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2014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的 APEC 第 22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首次提出了绿色供应链议题并提倡建立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确定在中国天津建立一个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示范中心，共同促进整个地区产业绿色化发展。我们为什么谈绿色供应链的内容？

从 2011 年开始，我们参与中国绿色供应链及其网络建设。我们开始先在京津冀、长三角做了大量试点工作，目前全国绿色供应链做得最好的地区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其中东莞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获得环保部认可的市级绿色供应链试点城市。2016 年，东莞市政府协调环保、发改部门将环保传统污染物排放数据、节能数据、低碳排放数据统一结合起来，推出了“东莞指数”作为对东莞制造业的评价依据。在此基础之上，开展绿色供应链工作，2016 年东莞市率先成立了广东省绿色供应链协会，并以此为平台在全省推广东莞经验。

东莞在绿色供应链领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长久以来，广东在环境质量改善和绿色转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成绩。广东省 2015 年率先实现空气质量达标，全国 74 个规模以上城市当中，排名前 10 的城市中广东占了大部分。2016 年广东三产结构已超过 50%，先进制造业附加值在整个工业增加值的比例超过了 48%，非化石能源超过了 20%，煤炭在能源中的占比下降到 42% 以下。广东的绿色供应链已走在全国的前列。

第二，大湾区绿色供应链的相关工作走在前列，跟整个经济的组成、经济的形态有很大关系，这里是以出口为主的世界制造中心。广东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特征以及和世界接轨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其绿色供应链理念走在了世界前列。

第三，绿色供应链发展的重心，除了向内进行提效、减污、降碳等方面工作以及出口绿色产品之外，更要力争出口绿色的标准。俗话说，低级卖劳动、中级卖产品、高级卖标准。中国在绿色供应链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下一步如果在行业标准制定方面做出努力，从出口绿色产品过渡到出口标准，中国人也可以像发达国家人一样过上舒适精致的生活。

大湾区的发展建设要走进世界湾区的前列，离不开民间组织和民间资本的助力。我本身就来自美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我有切身体会。在接触中我体会到，广东的民间组织特别是跟环保有关的民间组织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产学研相结合的民间平台在助力大湾区绿色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应该保持并发扬。

未来的绿色发展，创新是关键，我们要把大湾区建设成为绿色创新的温床，大湾区才能实现成为绿色增长中心的梦想。

建设大湾区， 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 李十中 /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



李十中

现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新的动力源，培育一个新的增长极，其创新是关键。而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绿色金融就是要支持低碳经济发展。

创新是非常热的话题，最近据说要废除燃油车，有的说 2030 年，有的说 2040 年。废除燃油车后用什么替代？一个是插电式的电动车，需建充电桩；一个是轻燃料电池，需建加氢站。充电桩、加氢站等基础设施 2030、2040 年建成可能有难度。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乙醇，乙醇和水反应可以产生氢气。有了氢可以解决加氢站的问题，也不用新建基础设施。将来加油站装的不是汽油、柴油，而是乙醇，这样肯定更便宜。这不是畅想，已经可以实现了。

大湾区要建成国际航运中心，航运中心的船舶用的是重油，重油的排放量非常大。船运的碳排放占全球的 20%，怎么解决碳排放问题？用燃料乙醇制氢，用燃料电池发电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乙醇从哪里来？

目前全球燃料乙醇总产量为 255.76 亿加仑，其中美国产量为 14700 百万加仑，占同期全球总产量的 67.5%；巴西产量为 7093 百万加仑，占同期全球总产量

的 27.7%；欧洲产量为 1387 百万加仑，占同期全球总产量的 4.5%。巴西现在燃料乙醇已经占到汽油消费的 45%，带动了汽车工业的发展。到 2020 年中国将全面使用乙醇汽油，如果汽车油箱里混合 10% 的乙醇，市场大约需要 1300 万吨。目前乙醇都是玉米乙醇，玉米乙醇生长地有限，大规模生产可能影响粮食安全。另外还有纤维素乙醇，但是纤维素乙醇目前尚不能商业化。高粱可以实现商业化目标。首先，高粱原产于非洲，也是中国东北的特产，它跟玉米不一样，种植范围特别广。第二，高粱生长周期短。第三，高粱耐盐碱、干旱。第四，设备简单，高粱制乙醇时间短，只需 24 个小时，而玉米制乙醇需要 50 个小时。

中国有 5 亿亩的盐碱地，而且大部分是连片的，如果把它改造，可以生产差不多六七千万吨的乙醇。而高粱可以吸收重金属，把它做能源利用还可以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目前这个技术是中国唯一能治理重金属土壤污染的技术，发展潜力非常大。

建立大湾区国际航运中心，要使用绿色船舶燃料，用氢来驱动船舶。我们还要把相关技术输出到“一带一路”。非洲缺少能源，90% 的农村没有电也没有油。“一带一路”除了搞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也可以把产业转移出去，比如广东可以向非洲销售家用电器。1 万吨乙醇可以带动 4 个亿的产值。

非洲土地广博，很多地可以种高粱。金融创新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投资？把最传统的农业与未来的制氢经济结合起来。我希望大湾区可以建成这样一个绿色中心。

立足中国国情，构建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

■ 李人庆 /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



李人庆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困境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关于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等问题早已进行了广泛深入讨论。快速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发展，虽然获得了 GDP 高速增长，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因而我们要调整发展战略，把绿色发展作为重要的发展方针。绿色发展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是真正的发展。

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提出生态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就是要寻找一个合适的路径，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应对生态环境、碳排放等问题。而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创新性地改变原有的传统观念，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来实现。

当前的技术革命为绿色增长提供了机遇，也面临巨

大的挑战。应该说，新的技术变革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束缚，清洁能源的发展为环境改善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也为新的产业增长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如何抓住这一机遇，迎接这一挑战，占领这一制高点，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抓住这一变革的历史机遇，打造优势产业，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调整？进而引领中国的绿色增长和绿色革命，创建中国新的绿色增长中心，成为绿色增长的排头兵、引路人，以及发展模式的创造者、示范者和传播者？

大湾区面临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机遇，中国的工业结构和发展结构处在变革的新周期，存在一个迭代差，可以弯道超车去改变原有传统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不必重蹈覆辙。中国在信息革命的很多方面已做出经典范例，相信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上，也可以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发展的优势在于市场规模大、潜力大，它对于整个产业变革具有强大的市场牵引力，在这些方面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首先需要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基础在于知识产权的变革，尤其是知识产权中“公共产品”的保护，需要政府的投入。

环境保护、绿色发展需要创建全球利益共同体，离不开合作。环境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平等、全覆盖、公平的环境制度。例如，现在浙江已经开始将公共服务费、卫生费向农村覆盖，这有利于推动解决农村的污染及垃圾处理问题。可以说中国环境问题的难点、重点在农村。解决农村的环境污染及垃圾问题，离不开社会的参与及公共财政的支持，因为涉及跨地区、跨产业等问题。这些方面需要突破原来的体制机制，建立城乡融合的创新体制机制。

加强环境治理，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发挥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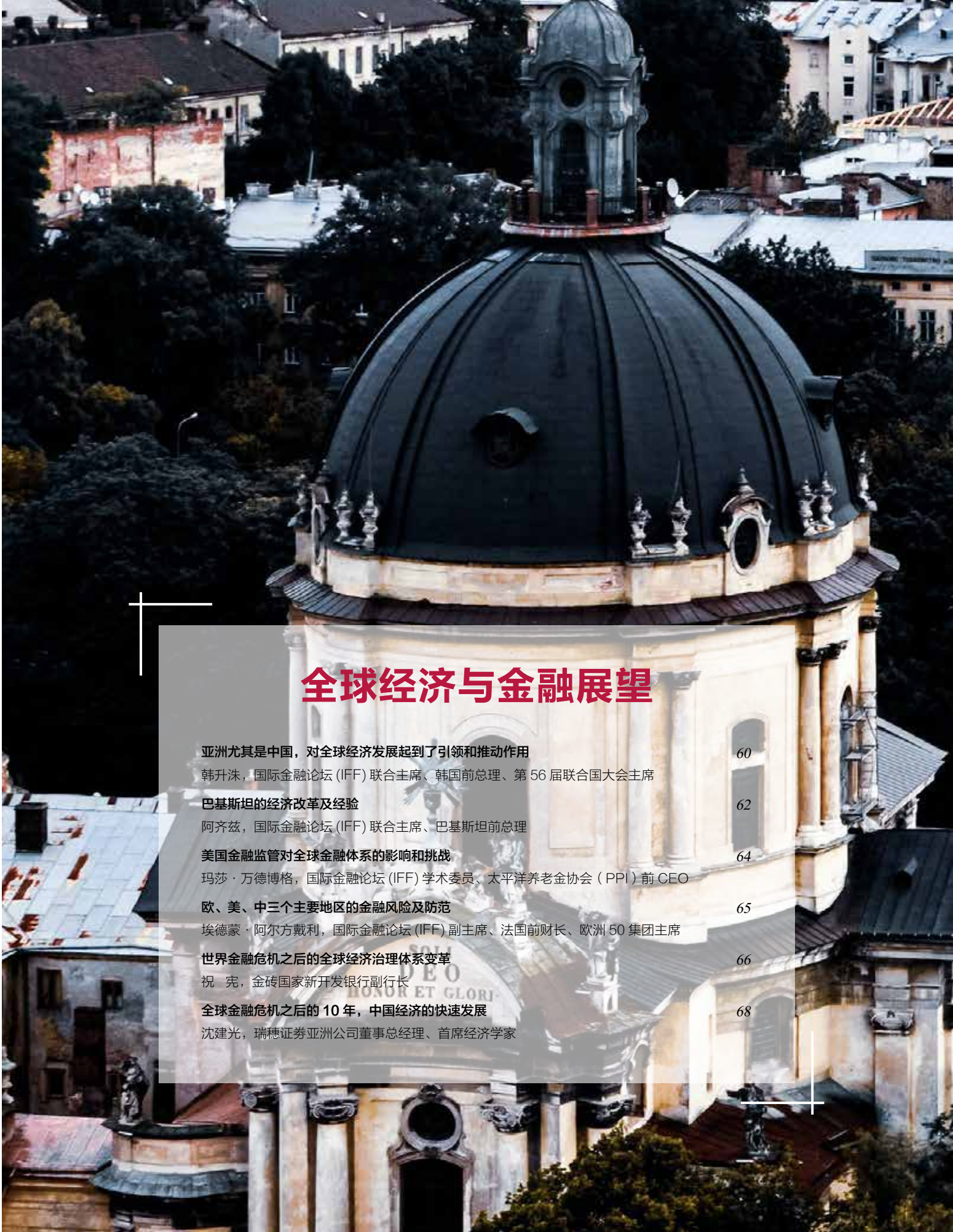
新的技术变革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束缚，清洁能源的发展为环境改善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也为新的产业增长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如何抓住这一机遇，迎接这一挑战，占领这一个制高点，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的特色。中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号召力、执行力及整合能力，但是在解决环境问题上，更需要社会参与，更要注重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在于利益共同体，仅仅靠行政手段是不行的，需要依靠市场机制，需要解决涉及污染和环保产业的所有人的生计问题。德国绿色发展政策的核心就是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发展，解决中小企业的就业问题，通过新的产业增长点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实现产业转型。中国现在很多地区在做城乡的互融，包括城市的绿化，绿植产业对农村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机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环境作为一个公共资产，需要新的评价体系、新的管理制度。在管理上要严把源头的污染，政府要加强对考绩、考核的管理，充分发挥中国政府强大的整合能力和执行力。应该说环境和产业的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下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解决人们美好生活愿望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领域。在这些方面已达成社会共识，关键是如何把共识转化为行动，形成新的发展机制。

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需要创新、开放，要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在立足中国国情基础上，创新性地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通过抓住清洁能源产业变革机会，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绿色增长的目标。



全球经济与金融展望

亚洲尤其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	60
韩升洙，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巴基斯坦的经济改革及经验	62
阿齐兹，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美国金融监管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和挑战	64
玛莎·万德博格，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太平洋养老金协会 (PPI) 前 CEO	
欧、美、中三个主要地区的金融风险及防范	65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法国前财长、欧洲 50 集团主席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66
祝 宪，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 10 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68
沈建光，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亚洲尤其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

■ 韩升洙 /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在金融危机 10 周年之际，回顾、反思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 10 年，展望未来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具有特别意义。但我今天更想跟大家谈一谈对未来的展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全球经济历经缓慢增长的十年，现在终于见到曙光，全球经济开始复苏。2017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修正了其增长预期，预计全球在 2017 年、2018 年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预计 2017 年和 2018 年全球经济增长分别约为 3.6% 和 3.7%，比 7 月份的增长预期提高了 0.1%。

在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团结合作，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政策、加强监管，并采取一系列财政金融刺激措施以确保金融体系能够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正常运作。所以必须说，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G20 扮演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稳定局面、促进经济复苏，G20 推动开展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监管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包括进行一些反周期、宏观审慎的监管，以及实施区域双边的金融安全网等一些做法。

一些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它们的经济增长大概持续放缓了 10 年，所以他们的复苏也是非常缓慢的。欧美出现了长期的缓慢增长，不平等现象导致政治风险以及反全球化、反全球贸易的情形，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政治不稳定的状况，例如英国脱欧。在全球经济灰暗中，亚洲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其经济增长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源和重要支撑。在全球经济放缓的 10 年里，亚洲尤其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是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2016 年，亚洲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 68%，IMF 预计 2017 亚洲仍然会为全球贡献 63% 的经济增长，而中国一个国家就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这也是全球经济能够度过非常困难的结构性改革期的原因。中国经济高增长等正面外部因素，是过去 10 年当中，帮助全球解决金融危机负面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但是亚洲的经济增长不完全是非常美好的，也有一些负作用。亚洲尤其是中国缓冲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暴露了其脆弱性，信贷、债务在扩大。信贷在中国 GDP 中的占比是非常高的，一些企业债高达 165%，家庭债也在持续在上升，未来可能会有风险。高杠杆也不只是在中国出现，很多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也在使用，预算以及信贷的扩张大幅增加了他们的杠杆。信贷的扩张、杠杆大幅提升在亚洲是非常常见，是其新的脆弱性。

在全球经济灰暗中，亚洲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其经济增长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源和重要支撑。在全球经济放缓的 10 年里，亚洲尤其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是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

高债务、高杠杆将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所以，中国出台了几个重要的政策：

第一，不再专注于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通过货



币和财政政策调整以前过快的信贷增长，强调经济包容、普惠增长，而不是 GDP 高增长。

第二，降低信贷，加强监管，降低风险。因此，2017 年 7 月成立了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另外就是提高外国投资资产的质量，这些海外的投资其实占了这些投资国 GDP 非常大的比例，会影响其中期债务的稳定，所以必须加强完善这些项目的监管，以保证其可持续性、盈利性和保持活力。现在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些国家 GDP 的总和超过了全球 80%。所以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对世界很重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全球经济、贸易、财政都紧密相关。

虽然亚洲包括中国的经济有脆弱性和风险，但仍然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认为中国具有这方面的资源、支持和缓冲，并且在政治方面有坚定的决心，推动中国经济向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发展。我想这不仅是对中国、对亚洲，对全世界来讲都是好消息。管理金融的风险及脆弱性仍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挑战无处不在，所以我们要随时保持警觉，我相信这对于中国和亚洲的可持续增长都是非常重要的。

巴基斯坦的经济改革及经验

■ 阿齐兹 /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阿齐兹

1999 年我在花旗银行工作的时候，接到总统的电话，他说：“阿齐兹先生，我们找过很多金融家、银行家，但我认为你是担任财政部长最适合的人选。”当时巴基斯坦已经没有任何的储蓄、存款了，但我接受了挑战，因为我非常荣幸能够为祖国做一些贡献。

我当财政部长期间遇到过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判。IMF 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但他们的某些思维模式跟我们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和 IMF 刚开始讨论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交集。他们总是强调改革和增长，而我们认为增长是最重要的，没有增长谈改革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最后是拿到了一些钱。

我们不受 IMF 的指挥，自己确定了经济改革政策，包括通过创造就业岗位解决我们面临的发展瓶颈，当然最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IMF 受制于自己的机制，他们采取非常标准的做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事与愿违。

我认为要有效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首先要明确问题的根源，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解决方案。巴基斯坦是一个拥有 2 亿人口的小国，政府的权威性不是非常高，我认为可以用三个方式解决经济问题。

首先就是要能够让监管宽松化，另外就是私有化、自由化，这三个是关键词，可以让我们的市场释放出非常大的力量。比如通讯、银行体系一年多的时间就从国有化转为私有化，而且没有人抱怨私有化的过程不透明、不公平。此后，我们进行其他领域的私有化改革，可以说私有化是巴基斯坦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举措。我觉得一定要跳出过去的思维框框，不能僵化死板，比如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往往有固有思维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灵活性较小，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可以有更多灵活性的。

在完成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改革后的五六年时间，巴基斯坦的 GDP 翻了一倍，经济增长了、就业岗位增多了、居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与此同时，外资也纷纷涌入，从几亿变成了几十亿甚至几百亿。

所以我想向发展中国家建议，要发展本国经济，摆脱经济困境，尽量不要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跟他们洽谈，因为 IMF 要给你注资就会相应给你提

出很多限制。巴基斯坦就是因为摆脱了这样的限制，才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当然政策性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要进行改革，发达国家也需要，都要用新的思维来做事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愿意

进行改革，不是领导缺乏创新思维，而是不愿意承担成本。我在巴基斯坦力主私有化改革的时候，有些人把我的大幅照片到处焚烧，有些人甚至想弄死我，但我没有退缩，因为我相信虽然改革伤害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却是对国家和广大人民有利的。

巴基斯坦私有化改革的结果有目共睹，就业岗位、



居民收入增加了。以前骑自行车的人改骑摩托车了，本田摩托车厂扩容，铃木等厂家也先后进驻巴基斯坦。国有电信公司效率很低，我们就把它拍卖给了一家阿联酋的公司。现在巴基斯坦已经有五六家电信公司，形成了市场化良性竞争。于是手机普及率快速增长，农村也有手机信号了。IMF 是不会给此类建议的，巴基斯坦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有自己的策略，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如果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策略，跟 IMF 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等于放弃了自我管理的权利。当然，实施自己既定政策的过程中，也可以听取 IMF 的建议和意见，毕竟大家都会犯错的。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 IMF 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常人，它们并非全知全能，每个国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主张和策略，巴基斯坦的策略就是自由化、私有化、开放市场、开放资本、开放外币，当然有人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小国家，其经验可能不适用于大国，但是 2 亿人并不少。我认为应让各国政府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而不是被别人指手画脚要这样不应该那样。各国政府不应该畏惧变革，要有主人翁精神才能成功变革。

最后，我要说在我力主的改革下，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当时建筑工人都不够用了。总之，自己国家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没有任何条件地去借钱，说

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想想办法吧。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跟别人讨论或谈判的时候，要尊重别人的意见，但绝不能完全依赖别人，要有主人翁精神。

美国金融监管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和挑战

■ 玛莎·万德博格 /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太平洋养老金协会（PPI）前CEO



玛莎·万德博格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当时几乎累及全球经济面临崩溃却不能忘记。我觉得现在美国监管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全球金融体系面临新挑战，就此我想说两点：

一、目前的国际经济大背景

现在大家普遍感觉经济前景比较乐观，我却认为乐观是一柄双刃剑。全球金融危机推动我们加强监管，出台了很多金融风险防范措施，大家觉得可以保持经济的稳定了。现在也确实有一些迹象让我们有这样的乐观，比如美国的企业减税，促进了企业健康发展，增强了企业的信心，全球贸易额也提高了。投资的风险偏好水平也提高了。最近 IMF 的一个报告表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终于提高了，前景是美好的、金融环境是稳定的，所以这些都让我们觉得好像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 IMF 报告还说了现在市场价格的波动性以及现在政策的不确定性两个问题。一开始大家总讲多边主义，现在大家又在谈民族主义。IMF 的报告分析了三个区域——美国、中国和欧洲。报告的详细内容大家都知道，我不在此赘述，我强调的是乐观可能会

影响判断的准确客观性，是一柄双刃剑。

二、现在美国政府的情况

现在我们处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政治环境非常特殊，美国政府的经济决策可能会影响全球的经济，失当的决策可能会导致我们所担忧的经济下行风险。

当我们评估美国的政策环境时，我们应注意影响美国政策环境的根源是两党政策或者说是白宫缺乏领导力所造成的。所以美国其实正在重新塑造其意识形态，欧洲也是如此，这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市场，并且会破坏好不容易稳定的财政政策。美国 2016 年大选民主的倒退、英国脱欧，其实都是重塑意识形态造成的，所以我认为它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是较大的。

我们必须在全球寻找到新的稳定结构，必须要用整合的角度来去解决问题。现在美国的情况不可能再推出像《弗兰克法案》（全称《多德·弗兰克境外公司道德行为法案》）之类的改革法案，因为白宫方面缺乏领导力。实施的税务改革，有可能使用行政的方式进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所以可能会看到比较小型的国家性银行能够加强监管。但是如果国会的政治运作不良，要怎么样去推动呢？奥巴马政府及其以前的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现在也希望能够让监管部门负责加强美国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也就是说他们会推出一些新的监管措施。目前特朗普总统已指派了新的监管部门领导，包括通过参议院审批，任命了新的货币和银行监管的负责人。

特朗普总统以前是做房地产的，所以作为总统他一直以来受到了很多批评和质疑，他的行动也考验了美国的民主基石，我相信美国的制度最终还是会胜出。我希望 10 年后当我们回顾的时候，可以说今天所做的改革是有益于全球经济发展的。

欧、美、中三个主要地区的金融风险及防范

■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法国前财长、欧洲50集团主席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我认为有必要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进行回顾，因为未来还会有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情形，也还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不平衡，特别是美国出现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新兴国家过高的储蓄，造成了通货紧缩的情形。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包括过于宽松的监管、次贷问题以及高利率形成泡沫。所以，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广泛的。

金融危机对全球进出口贸易也有很大影响，在欧元危机当中，我们看到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市场缺乏信心就没有办法解决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进而导致货币市场或者金融市场危机。在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我们看到世界经济不平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货币方面，另一个是在其运作方面。从美国方面来讲，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原因是商品服务行业资金过剩、市场运作不良、金融监管松弛，导致次贷危机和 CDO 产品出现，经济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为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家尤其是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常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放松货币政策来支持全球金融总需求。美国也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全球流动性，压低了利率。欧元区反应较慢，导致欧元区金融市场、主权债务信心降低，欧洲央行（ECB）也被迫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下，现在全球经济情况已渐趋好转，利率、油价比较低，流动性比较大，金融资产价值上涨，所以大家现在对经济形势感觉比较乐观。但是现在的货币政策环境不可能长期保持，金融市场肯定会调整，加上很多国家累积债务持续增多，地缘政治环境不稳定等因素，金融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

现在欧、美、中三个主要地区，都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所以要谨慎地防范风险。首先美国货币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以前美联储实施的货币政策效果良好，所以想持续延用，但如果长期持续延用经济泡沫会越来越大，有泡沫破灭的风险，而且越晚调整风险越大。其次是中国现在的债务、信贷比较高，是 GDP 的 250%，虽然现在还可持续，但是中国政府希望避免债务继续增长的风险。最后欧元区的问题是量化宽松政策使欧洲中央银行不得不买债，掩饰欧盟成员国之间金融市场分裂的情况。所以各个国家，尤其是欧、美、中三个区域的国家应该利用现在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机遇，进行国内经济调整的同时，积极促进全球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够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 祝宪 /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祝宪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距今已近 10 年，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是它的影响远没有结束。

一、全球经济恢复增长问题

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已开始恢复增长，无论是市场还是国际金融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预期都比过去更正面、更积极了，但仍没有脱离平庸经济，也就是还没有看到经济的强劲增长，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可以说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可能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界都应该做好准备，即我们未必能够看到下一轮非常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因为 10 年前发生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周期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

二、世界各国经济如何进行结构性调整 and 改革

各个国家经济改革的力度不一样，但整体而言我认为改革是不到位的。很多应该进行快准狠改革的地方，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不得不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式。所以从全球范围来讲，经济结构调整由于政策不到位给经济增长尤其是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三、逆全球化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所谓逆全球化问题，或者说全球化倒退问题。其原因很复杂，我想主要讲两点：

第一，逆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再分配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很多领域出现了分配不公平问题，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当然这也反映了旧经济和新经济之间的矛盾，那些在旧经济中的既得利益者，认为其利益受到了损害的，就会对全球化不认可甚至进行反对。我觉得这一点在下一轮经济改革和全球治理中不应该被低估。

第二，中国面对这种比较复杂的、不确定性较高的经济形势，可以做的就是做好准备的同时做好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要继续深入进行经济改革，特别是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高效益和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快速转型，而不是继续投资性、扩张性、外延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

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近 4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 80%，其中最大份额来自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希望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加大发言权，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非常正当的。然而，到目前为止争取权利的进展是比较缓慢的。现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制定权主要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手中。在制定规则时，OECD 国家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执行规则时，又经常使用双重标准。他们非常刻板地把 OECD 国家的要求套用在发展中国家，不顾及这些国家的实际条件，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承受能力。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美欧货币当局很少考虑政策外溢效应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合理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没有拿出一套清晰、可操作性的对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方案。另外，虽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在上升，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规模和成熟度也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如何采取斗而不破的方针积极争取权益，应该是下一轮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在同舟共济的基础上协商做事，否则可能会陷入争执中，甚至出现破裂的局面。

五、从战略层面认识“一带一路”倡议

很多人把“一带一路”倡议简单看成是在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搞互联互通的倡议。其实从战略层面讲，“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带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进入新版全球化，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纳入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契机。我们应该对“一带一路”有一个比较高的战略上的认识，而不应不仅仅把它看成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六、金砖国家的经济结构性调整 and 改革

作为金砖国家创立的新开发银行，当然更关注金砖五国的经济。除了中国之外，其他金砖国家在经历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大宗商品波动导致的

经济困境后，现在经济基本都已企稳回升。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勇气进行结构性调整，特别是那些将初级资源类产品作为本国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有一个经济学概念叫资源诅咒，指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国家，往往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经济发展慢，主要原因是过分依赖容易获得的自然资源，在经济结构上制造业、服务业等份额被挤占弱化。所以，虽然金砖五国现在出现了比较好的增长势头，但是否能够持续增长关键看这些国家的政府能不能有勇气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and 改革。

我相信金砖五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同时也能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格代言人。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 10 年，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 沈建光 /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 10 年，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已经复苏，主要经济体的 GDP 也大多已经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2017 年二季度，美国、欧洲经济增长分别是 3% 和 2%。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全球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很多西方国家已创历史新高，资本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然而，复苏与繁荣的表象下各种风险也在暗流涌动，比如地缘政治危机、民粹主义崛起、逆全球化浪潮等。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从经济方面看，我认为主要是央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货币超发，造成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进而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贫富差距拉大，给民粹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总规模已经增长了 5 倍，欧洲、日本的央行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虽没有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中国的广义货币 M2 增长很快，中国的货币乘数也上去了。这里我提一下风险，中国虽然基础货币发行不多，但是广义货币过去 10 年增加了 4 倍，货币乘数上升很快，这里有影子银行、金融监管问题以及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信贷增速太快，中国政府已在积极布局防范金融风险，我觉得 2018-2019 可能是去杠杆的关键年，要治理房地产泡沫、控制信贷、控制债务，这些都是中国即将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完全听从美国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是根据本国国情总结摸索出自己的经验和路径。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尤其是贸易出口遭受严重冲击，为了应对风险和危机，中国相继采取了多项措施，截至 2010 年共约投资 4 万亿元。10 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刚爆发的时候，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今天已经是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了。这样一个全球贸易格局的巨大变化，我觉得中国是属于弯道超车了。在我 2003 年入职欧洲中央银行（ECB）之前，ECB 是没有中国经济学家的，因为 ECB 认为没有研究中国经济的必要，可见 21 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还比较低。然而现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外，从国内的内需市场看，10 年前中国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今年中美两国的零售市场已经旗鼓相当了。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有了“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高铁虽然不是中国发明的，但现在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数已占全球 60%，而且中国高铁的技术已经世界领先。中国移动支付的普及率已高达 77%，而美国只有 48%，日本仅为 27%，在移动支付领域中国堪称一骑绝尘。中国在共享单车和网购的领先情况有目共睹，我不再逐一列举数据。

中国高新科技崛起以及产业升级更新换代的速度都是世界第一。中国新能源汽车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果，2017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量达到了 1,867,000，占全球 50%，同比增长 51.6%。金融危机后的 10 年，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多困难，但中国远比其他很多国家做得更好，在多个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

今天美国进口的电器设备产品中有 40% 来自中



国，机械产品有 32% 来自中国，所以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非常困难，因为其大部分高技术产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这完全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它的成本就要大幅度上升。虽然中国工资水平在过去 10 年有大幅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还在中国。比如，美国 53% 的雨伞、82% 的玩具都要从中国进口。这些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从别的地方进口，价格将大幅上升。美国的工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在逐年下降，有人说富士康要在美国生产苹果机，但主要由机器人制造，对美国就业并没有什么帮助。从二战以来，美元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现在中国也在努力把人民币推向国际化，将来也会改变全球金融格局。

总之，中国通过 10 年实力发展，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贸易格局，也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加强金融监管， 维护金融安全

■ 周延礼 /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



周延礼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监管的角度来讲，理念上大家谈的往往是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包括制度、标准、监管理念、具体做法等，这些都有制度规范。国际上不论是银行监管机构，还是证券监管机构，或者是保险监管机构，都有一套制度标准。比如说保险监管领域，国际保险监管官协会（IAIS）已有具体的监管标准，但现在还没有形成全球统一的监管标准。欧洲的偿付能力，美国的风险监管，包括中国的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这些从不同角度构成全球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逐步也要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监管标准。

在全球证券监管方面也有一套对全球的证券监

管体系，包括并购的标准、市场的标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标准，这些都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具体制度、标准、规范。接下来大家研究最多的就是微观审慎监管问题，就是关于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的问题。这些都是基于维护市场平稳健康、稳定发展的需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作出的安排。

在这里，我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介绍为什么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又为什么要强调微观审慎监管，这些都是从维护金融安全的角度来讲的。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金融稳则经济稳，金融活则经济活。维护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包括社会发展，是具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所以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在建立现代金融体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至关重要。在贯彻落实中央对金融监管的具体要求时，我想有几点需要做统筹思考。

第一，要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这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根本的要求。在金融领域，银行间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等都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对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风险总量增加，这些风险大都与金融密切相关。而且当前金融风险的形成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如果不能及时进行预防和控制，就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面对这些风险和一些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在跨国、跨机构传递可能性加大的情况下，加强金融监管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所以要统筹考虑、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监管的角度来讲，理念上大家谈的往往是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包括制度、标准、监管理念、具体做法等，这些都有制度规范。

全球金融治理： 风险、监管与合作

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安全	71
周延礼，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	
加强金融监管，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73
贲圣林，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执行所长	
增强新兴经济体发言权，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国应发挥更大作用	75
阿什法克·哈桑·汗，巴基斯坦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共建大珠三角金融圈，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77
王景武，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局长	
中国金融监管的趋势	78
万 喆，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关注系统性风险，构建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80
申曙光，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面分析，从维护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进而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第二，要立足于促进经济发展，来思考、把握金融监管。经济越发展，金融越重要，所以要把金融的功能和作用体现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说金融一定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优化金融结构，深化金融改革，确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在这方面，党中央、国务院有一系列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在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也特别强调，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第三，要注重把握金融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风险，特别是一些表现比较突出的风险。比如，金融机构的急功近利问题、贪快求全问题、监管制度不执行问题，甚至是规避监管制度问题。比如，在利率环境错综复杂，资产匹配难度较加大的情况下，一些

金融机构逃避监管，发展模式相对比较激进，资产负债错配，甚至产生一些相互嵌套的风险，存在较大流动性的风险。特别是有些资管产品的多层嵌套，极易产生风险的交叉和传递。

这些都需要高度重视，对风险的本质、演变有高度警觉性，弥补监管制度的漏洞，加快补足监管制度的风险，清理金融市场乱象，切实担负起防范风险，引导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的责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对金融的创新，也要加强监管，不然的话就会形成一些新风险。

加强金融监管，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贲圣林 /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执行所长



贲圣林

智能化、科技化与新金融、传统金融的融合是大势所趋。过去这段时间，金融科技（fintech）可能是最红火的词。其实，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不是过去两年才有的，而是差不多过去七十年一直就有的。从第一台电脑诞生起，金融和科技就不断地融合，包括第一个信用卡、ATM 机，都是金融科技融合的产物。只不过最近这个趋势在加速。

金融科技化、金融智能化、金融虚拟化，对监管和整个行业的稳定性，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第一，去中心化带来的新问题。都说金融科技要去中心化，但真正做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基本上常用的只有两个。一方面好像很平等，但同时又有一种行业寡头的趋势出现，呈现出了一种新的中心化的特征。如何去平衡这个？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二，跨界化带来的复杂化。虽然我们有些产品被简单化、标准化了，但同时它又因为跨界的特征，牵涉机构比较多，又是虚拟化的，反而让整个通道显得复杂化。

第三，无人化、智能化，或者机器化带来的安全问题。无人驾驶汽车出车祸的时候，责任是谁的？同样，

金融行业的智能投顾也是由模型和算法靠机器自我学习，提一些投资建议，如果中间有偏差，怎么办？如果这个机器变成坏人了怎么办？谁来负责？是投资者、股东还是他后面的别人？这造成了很大的挑战。还有数据安全的问题，今天的数据量非常大，机器化、无人化、智能化时代的数据传输速度又很快，数据一旦泄露，出现数据安全问题就是不可收拾的状态。

同时，全球的金融监管面临着这样几个挑战。

第一个是监管大大滞后于市场发展。金融科技或者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往往都超越了或者提前于我们的监管体制和政策，比如说第三方支付，中国的第一个第三方支付——支付宝是 2003 年开始运作的，但它真正拿到牌照是八年之后的 2011 年。这种监管滞后于市场是普遍现象，如何尽量缩短这种滞后，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二个是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监管相对滞后于国际先进做法。目前，在全球金融科技领域，虽然有些地方的发展不像中国互联网金融这么繁荣，但它们的一些监管规则、体制在主动作为方面，我觉得做得比较好。如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

第三个是金融科技巨头的监管问题。中国一些金融科技巨头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许多福利，也为中国在这个领域争了很多光，全球主要金融科技巨头的前几名目前基本上都是在中国。这些金融科技巨头实际上属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如何监管它？给我们提出了新挑战。

对于金融或者金融科技，究竟要怎么去监管？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想提几点共识。首先，金融要稳定；其次，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造福社会、造福人类；再次，金融要处理好创新与稳定，创新与发展的关系；最后，金融要保护好消费者的利益。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高效、美好的金融体系。究竟怎么做？我提三点。

第一，学习借鉴国际经验，补齐规则短板。全球金融科技有三个主要驱动力：一是市场，这个中国不缺乏；二是技术，中国的互联网应用技术远远领先于世界，虽然有些核心技术可能跟美国相比还有些差距，但中国有



非常大的优势，这是中国的长项。中国相对比较短板的，是第三个——规则。我这里讲的规则是广义的，包括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体制、监管能力。

第二，加强机构能力建设。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成立，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发展。但我们的金融监管方式有很多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属地化管理。省、市、区各级政府部门都面临如何管好金融的问题。有的地方金融办公室往往是发改委下面的一个部门，人手非常少，个别区域甚至只有一个人，监管人手不够、能力不足、手段有限。如何补好能力赤字，补好人才赤字是非常大的挑战。

第三，要打造一个比较友善的生态系统。包括市场主体、企业自律问题、行业协会问题、监管体制问题，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引导问题，这才能把金融科技或者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向未来。

总结来说，金融科技在给我们带来许多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与风险，关键是我们要如何做好应对。

增强新兴经济体发言权，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国应发挥更大作用

■ 阿什法克·哈桑·汗 / 巴基斯坦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阿什法克·哈桑·汗

最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受到一些攻击。这主要是由于全球化实施过程中，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共享，有些国家和地区更加繁荣，有些则没有受益，我们也担心全球化的这种影响会更加扩大。但事实表明，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实现了持续经济发展，减少了贫困，受益巨大。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说明全球化可以带来成功，过度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利于全球经济的恢复。

目前，对于全球化不满的根源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中发言权不够。

这些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裁说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 80%，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中国会对今后两年全球经

济增长贡献 35%，然后是美国 17.9%、印度 8%、欧洲是 7%。但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代表性并不匹配它们对全球增长和繁荣的贡献，全球金融治理还没有能够反映出这种新的现实。比如 IMF 四分之三的资源由欧洲的多个国家占有，最好的人才也都是放到了欧洲，俨然已经变成了欧洲的 IMF。这是不公平的。

因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有公平的发言权。事实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发言权，可以增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合理性。全球 85% 的人口和很大程度的 GDP 是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所代表的，参与全球治理，可以保证它们开放市场，并实现市场的一体化。

在全球经济中，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福音。我们都在看着中国，希望它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来改善全球金融治理，带来全球金融稳定。中国也意识到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的不足，并且开始发挥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作用。

首先，中国积极在现有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努力改善全球金融治理。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成功地把人民币放到了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成为世界五大储备货币之一。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以减少美元带来的压力。中国已经与许多国家建立了货币互换机制，目前约有 22% 的国际贸易是以人民币结算。但仍有 45% 的跨界交易用美元结算，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中 60% 是美元。

其次，中国也在建立新的机制来补充和加强现有金融机构的作用。比如中国倡议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起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行的

我们都在看着中国，希望它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来改善全球金融治理，带来全球金融稳定。中国也意识到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的不足，并且开始发挥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作用。



研究表明，到 2030 年之前，亚洲至少需要 26 万亿美元的投资，才能让各国有效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现有多边机构没有力量为这样巨大的投资需求进行融资，中国倡议设立的两个新国际金融机构，可以有效补充世行和亚行的融资不足。

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下，一旦再发生 2008 年那样的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可能独立撑过去，它的力量已经捉襟见肘，所以必须要有区域措施的补充，需要区域金融治理的安排，这种需要从未像如今这么急迫。

我建议中国考虑采取更多措施，发挥更有建设力的作用，来补充和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以保持国际金融稳定。甚至可以在亚洲建立另一个机构来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可以将它称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亚洲货币基金倡议，这个机构肯定可以支持 IMF，帮助 IMF 减少压力，以保持全球金融稳定，减少全球金融风险。

共建大珠三角金融圈，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王景武 /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局长



王景武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近年来，中国顺应这一大势，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从金融治理方面来看，中国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组织体系的重要建设者。比如发起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搭建了新的金融平台。

中国也已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推动人民币成功加入 SDR 货币篮子，加快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步伐。中国正在成为金融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在 G20 框架下，倡议设立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将绿色金融列入 G20 峰会的议题，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明确了目标，

画出了重点。可以预见，今后中国将会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更加积极的行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中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一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推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存量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同时稳步推进增量改革，培育和发展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

二是继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双边货币互换，区域货币安排等货币合作机制，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三是主动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反映更多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规则体系。

四是运用金融工具，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增强金融服务的包容性，让各国人民共享全球金融发展的成果，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完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投融资体系，助力增强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活力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可以在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规则对接以及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广东将按照党和国家关于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部署，加强与港澳金融业紧密合作，共建大珠三角金融圈，探索便于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努力构架更加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金融体系，为参与全球治理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中国金融监管的趋势

■ 万喆 /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万喆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过去多年了，但仍有很多东西值得反思。我认为其中最重要、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当时的信贷扩张造成了泡沫，至于信贷扩张是怎么造成的，目前有不同的说法。相关研究指出，当时的信贷扩张是供给端扩张，是金融链条过于延长或者是衍生品过于复杂造成的。这是主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联储加息。2000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出现了经济萧条。2001 年后，美国连续加息 12 次，使得房地产市场处于极度繁荣的状态；2004 年后，美国连续 17 次加息。最后，加息成为次贷泡沫被刺破的导火索。

从时间上看，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与新兴经济体的危机有线性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基本上是两头收紧中间宽松。1981 年达到了紧缩的顶点，1982 年发生了拉美债务危机，之后又发生了台湾经济泡沫破灭。

20 世纪 90 年代是前期宽松后期收紧。从 1994 年

开始，先后出现了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风暴、俄罗斯危机和巴西危机。2000 年以后是两头紧中间松，2000 ~ 2001 年收紧的时候发生了阿根廷危机。

不能说美联储加息导致联邦利率升高就是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但每次加息后新兴经济体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危机，说明这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关联性。

当然，这些新兴经济体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就是因为自身存在几大问题。一方面是储蓄率很低，短期债务规模在危机前快速上升。另一方面是进口替代战略失败，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非常大。因此，美联储加息货币政策收紧后，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跌，使拉美的债务危机马上显现。9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是 80 年代债务危机的延续。

另外，大家也注意到，并不是在美联储加息之初，这些经济体的危机就马上呈现，往往有滞后，是在加息周期将近结束的时候，才会引发新兴经济体的危机。

那什么时候是一个国家产生金融危机之前的脆弱时刻呢？一般来说是危机发生的前数年。美联储的政策由宽松转向紧缩，危机爆发，国际资本大量从这些危机国家流出。

对照这些历史教训，中国的危机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

目前，美联储在加息周期中，而且已经在缩减资产负债表（以下简称缩表）了。七年内，美联储的资产缩减了 5 倍，但并没有完全确定资产负债表最后要缩减到什么水平，大家

普遍认为基于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缩表目标应该在 10% ~ 15% 之间。从这一点来看，美联储缩表的速度和规模应该都不大。而且次贷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 46% 是短期债券，但目前长期债券占了半壁江山，短期债券大概只有 10% 多一些，因此，缩表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应该不会对整个市场造成特别大的冲击。另外，美联储加息的速度和幅度也受到一



定的制约。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十年期国债利差还处在历史较高水平，外债规模和偿还压力也比较小，跟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对中国的影响不用过分夸大。但是也应该看到，中美的利率联动的紧密性越来越高了，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对中美利率联动的影响更大了。

其实，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脱实向虚的趋势比较严重。宏观经济增速连续下滑，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很多钱都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同时，前几年金融监管整体趋松，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金融风险有一定程度的集聚，金融行业链条加长，衍生产品增多。

因此，那次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强调金融一定要变成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业。尤其是十九大之后，金融领域的改革，包括监管加强，是大势所趋。

从十九大报告透露的着力点来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目前的主要任务。具体来说，就是金融需要正位和归位。正位是说，金融是中央事权；归位是说，金融最主要的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

未来中国金融监管会继续加强，金融反腐会继续深

入，金融框架会再塑造，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短期看，协调机制应该会全面化、常规化；中期看，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期看，对财政政策也会提出更明确的要求。

关注系统性风险， 构建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 申曙光 / 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申曙光

我认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应该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而不是一些技术性风险或者操作性风险。而系统性风险更多地存在于金融系统的结构和方向上。根据这样的观点，我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要调整金融业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很多，就是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过去几十年，在全世界范围内，金融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发生了方向性的偏差，甚至在慢慢异化。主要就是脱实向虚、自娱自乐，形成封闭的体系，至少是有这样的趋势。这就造成了系统性风险。怎么调整呢？可以往四个方向走，就是民生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我认为，目前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比如说民生金融，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中国应该更加重视民生发展，健康、养老、医疗这些跟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既是服务业又是产业，而且永远是朝阳行业，金融要更加关注这方面的发展。正在加速发展的科技行业当然也需要金融支持。

二是要增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从治理

的角度来看，金融系统应该是开放的、有多主体的，而不是由少数国家所霸占；它应该是共赢的，不能只有少数国家受益；它应该是公平、公正的。按照这个标准，我想现在还没有形成所谓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最大的矛盾是二战以来形成的由美国等少数国家主导的金融体制，与现在的形势不相适应。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体量、金融体量大增，造成经济体系结构与治理体系的不相适应，形成一种冲突。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要增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过去几年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动改革，倡议设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平台，包括提出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 G20 峰会等。我相信，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一定会对全球金融稳定作出卓越贡献。

三是要充分认识保险业的价值，更加重视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就是风险管理。从全世界来看，过去几十年，保险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更是如此。而且保险业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它是一种稳定的发展，比如保险业强调责任分担，准入门槛比较高，偿付能力监管明确且到位。而再保险实际上是各国保险市场构成了一个主体，意味着可以在全世界分散风险。这些都说明保险业能够在金融体系中起到明确的稳定和支持作用。因此我建议更加重视保险业的发展，甚至可以借鉴保险业的体制和经验，构建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为金融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全球金融创新： 新技术革命与未来趋势

技术 + 制度双轮驱动，促进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	82
李东荣，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用好金融科技，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84
叶燕斐，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	
拥抱变化，拥抱“科技”未来	85
韦 青，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	
IPV9 在金融系统中的应用	86
闫伟宁，亚太网络空间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技术 + 制度双轮驱动， 促进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

■ 李东荣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李东荣

当前，全球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发展。金融科技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正日益成为全球金融创新发展的亮点和焦点。很多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监管环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也纷纷设立专门机构，探索建立金融科技的国际政策框架。经过几年的讨论和梳理，各方对金融科技逐渐形成了一些国际共识，比如注重并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消费者保护为前提，以发展普惠金融为重点，以风险防范为核心。这些共识对于各国促进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从市场规模和创新深度来看，中国的金融科技已位于世界前列。对此，我们既要注重往外望，不断吸收借鉴各国发展金融科技的良好经验；也要注重向内看，从中国的经济金融实际发展出发，充分考虑中国在市场基础、制度环境、监管安排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信息化时代要求的金融科技发展道

路，为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下面，就全球金融科技如何实现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我谈几点个人的思考和体会，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注重价值导向和创新实践的动态校准。金融业天然就存在着高风险性、强涉众性和内在脆弱性等特点。如果金融创新缺乏正确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导向，就有可能滑向自我循环、过度膨胀、非理性繁荣的境地，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发展历史上，金融创新过度或者说方向偏移所导致的危机在各国都屡见不鲜，最典型的就是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它们尽管规模和程度有所不同，但背后的机制原理都是一样的。

我国的金融科技发展绝不应该重蹈覆辙。因此，我们要把是否有利于提升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是否有利于加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作为基本评判标准，积极稳妥地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绝不能搞脱离自身发展阶段、超出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的过度创新，更不能搞打着创新旗号、规避法律监管、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伪创新。

第二，要注重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金融科技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扩大服务覆盖面、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同时，技术创新也带来了数字鸿沟、过度技术依赖、多重风险叠加等新挑战。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技术创新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应该注意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监管规则、治理标准等制度性安排，提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度，真正使金融科技创新有方向、有底线、有规矩。

第三，要注重金融创新和风险监管的适度平衡。客观地说，金融创新总是走在前边，但监管不能落后太远，也不能落后太久，要注意坚持掌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点，实现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动态博弈和良性循环。

一方面可以考虑借鉴监管沙盒、监管科技等新理念、新工具，建立能够试错、容错、纠错的包容性创新管理



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开展应用试点、产品测试，从而让金融科技创新走得动、行得通、做得正。另一方面，也要按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任何金融活动都要获取准入”的基本要求，通过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并行互补，建立金融科技风险全覆盖的长效监管机制。

第四，要注重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的有机协调。行业自律是一种典型的市场约束机制，能够通过标准规则、信息披露、自律惩戒等市场化措施，有效减少从业机构只顾及短期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培育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形成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资本。同时，行业自律还是一种有效的市场沟通机制，有助于降低政府与市场沟通的成本。

对于金融科技创新来说，建立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有机协调配合的行业管理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创新监管安排。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专门成立了金融科技领域的全国性行业自律组织——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自成立以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尊重市场法则、积极做好政府与市场的桥梁纽带，在加快建设数据统计、风险监测、信息披露、信用信息共享等行业基础设施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特别是以金融风险防控和消费者保护为重点，出台了信息披露、合同要素登记、资金存管等方面的行业标准和自律规则，在规范金融科技市场秩序、促进金融科技健康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

金融科技还处于不断发展、逐步成熟的过程中，还

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探索和推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愿与大家一道继续加强沟通、相互借鉴、通力合作，共同促进金融科技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用好金融科技， 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 叶燕斐 / 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



叶燕斐

对于金融科技，我想分享三点认识。

第一，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金融业务本身的性质。过去打算盘办银行，不能叫算盘银行，后来改成计算机处理数据，不能叫计算机银行，现在用了互联网，也不能叫互联网银行，因为银行的本质没有变。无论金融科技怎么发展，但金融的性质没有变化，这就意味着不能因为有了所谓的科技，就可以去从事金融业务，这是不允许的。任何金融业务，特别是涉及存款人、普通投资者的，都是必须授牌、特许经营的业务，这是需要特别明确、界限要很清楚的。

第二，金融科技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做很多工作。比如说银行怎么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客户，怎么更好地识别风险，怎么更好地管理、缓释和化解风险？在这些方面，金融科技都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获客方面，现在的互联网、大数据可以把社区、消费场景、个人的行为和信用联系起来，以更精准、成本更低的方式找到目标客户，然后再很好地触达客户，以更快的时效响应、服务客户。

在识别风险方面，对于消费者客户，过去都是通过

征信局的信用记录，但很多人刚开始时没有征信记录，现有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积累消费记录、支付记录，再加上信用记录，就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的信用情况，从而更准确、及时地识别客户风险。

管理和缓释风险方面，管理风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风险定价，只有在识别风险的基础上，才知道哪一类客户违约概率比较高。对于企业客户来说，可以通过物联网数据、能耗数据、物流数据、进货存货数据或者其他方面的数据，更好地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过程和资金流动情况，了解企业的物料消耗和投入产出状况，这样除了做财务方面的尽职调查，还可以做能耗、物流等其他方面的尽职调查，以便能更好地管理风险。比如订单对应的货到了什么地方，存货是在第三方库存还是企业自己的库存，物联网监测都能反映出来，这对于抵押物的风险缓释会很有帮助。如区块链技术，做供应链融资时，区块链技术要求合约各方都同时在计算机或者互联网进行登记分类账户。这对贸易真实性与各方合约的有效性都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也可以对管理和缓释风险起很大的作用。已经出现风险之后，怎么样化解风险，技术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第三，金融科技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监管。比如在互联网安全方面，金融科技本身可以更好地帮助机构维护信息安全，但也要防止客户信息泄露，带来新的网络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既要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也要对它进行一定的监管。

总之，金融科技对于促进金融发展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关键是要怎么更好地利用它，发挥它有利的一面，同时对其存在的潜在风险给予高度关注。

拥抱变化， 拥抱“科技”未来

■ 韦青 / 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



韦青

我并不是金融专家，但作为在技术方面从业几十年的老兵，在行业转型、技术创新方面有一些体会，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是金融与技术的关系。现在整个社会在创新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新的迷信，就是技术迷信论。但我认为，技术再怎么先进，也要为人服务。如果脱离了这一点，整天评比、打分、演示，就丧失了技术的本质。所以技术首先是一种能力，人工智能是人类可预见的未来发展最大的加速器，但它并不能代替人类的进步。金融与技术的关系跟人与技术的关系一样，是否能够主动的拥抱变革，至关重要。

其次是对数字化的认知。现在关于金融风险或者网络安全、区块链的讨论有很多，我个人觉得这里忽略了一个本质，就是对数字化社会的认知。从本质上来说，数字化最大特点是效率的极大提高，是效率提高产生的

一种成本下降。举个例子，一个水杯如果里面放入大一些的石子，可以放 15 粒，如果把石子打碎，同样的水杯能放 50 粒，如果打碎成纳米分子，这个杯子也许就能放 100 粒。数字化就是把物理世界变成 0 和 1，然后再用软件定义一切的方法，把它重整和改变，造成同一个社会、同一个金融行业，它的效率却比原来高了很多，这其实就是数字化的本质。

其实 FinTech 即金融科技进步非常快，金融行业的本质是数字化的数据，资金又比较充足，很早就能够利用这种技术，但如果对其本质理解的不够，还是有危险的。我们常说，互联网+ 或者互联网企业战胜了传统企业，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更准确地来讲，应该是抱残守缺的传统企业被勇于创新的新兴事物打败了，跟技术没有关系，是理念的保守、落后造成的。任何抱残守缺都会被新兴事物打败，这是先进的生产力跟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

第三是智慧社会来临的步骤论。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一幅对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更重要的是下联，“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现在技术浪潮肯定来了，而且远比互联网、人工智能要大得多，这是一场革命，很多行业、很多人会被淘汰掉。“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这次浪潮绝对不只是技术的浪潮，最

关键的是理念的解放，生产关系的解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工具，世界只需要极少数人研究和开发这种工具，但整个社会的人都需要会使用这种工具，谁能高效地利用这种工具，谁就能赢得这轮工业革命的先机。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工具，世界只需要极少数人研究和开发这种工具，但整个社会的人都需要会使用这种工具，谁能高效地利用这种工具，谁就能赢得这轮工业革命的先机。

IPV9 在金融系统中的应用

■ 闫伟宁 / 亚太网络空间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闫伟宁

国家经济运行离不开货币，法定货币必须具有非常强的主权国家信用，这种信用来源于货币要同一种能够垄断的必需品进行连接兑换。这种必需品除了此货币外，无法进行交易，具有这种属性的商品就是货币锚，没有锚的货币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能长久。

纵观全球经济，世界货币锚的发展轨迹经历了几个阶段：二战后，美元通过与黄金挂钩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使黄金成为世界货币锚。1971 年 8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毁灭。美国又通过中东战争找到了新的货币锚——石油。然而随着新兴国家的强势崛起，对美国主导地位造成冲击，同时美国自身影响力衰退，各国政府纷纷寻找新的货币锚作为稳定货币的基础。

如今，经过中国科技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

奋斗，IPV9 作为新一代可靠的世界货币锚应运而生。

首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014 年对相关技术报告的投票文件显示，中国、美国等 8 个国家对中国专家主导的未来网络〈〈命名和寻址〉〉〈安全〉投了赞成票。这也就是说，这项中国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 IPV9 研究得到了国际认可，可作为数字货币锚。

其次，在中国设置根域名服务器的法律依据。2016 年 6 月 1 日，我国工信部发布《基于射频技术的用于产品和服务域名规范》（SG/T11605-2016），向世界公布了中国十进制网络的根服务器。十进制网络的主目录对应因特网的主目录有 15 台，一台为主根服务器，放置在中国，其余均为根域名服务器。

第三，IPV9 与 IPV6、IPV4 的比较优势。现在全球基本上都在使用 IPV4、IPV6。相较于 IPV6、IPV4，IPV9 更灵活、储存量更大。而且用 .chn 主权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替换了之前的 .cn、.hk，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更重要的是，不同于 IPV4、IPV6 的先通信、后验证，IPV9 采用先验证、后通信的方式，保证了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能。IPV9 还支持资产地址空间锚，这是 IPV4、IPV6 不具备的能力。

网络空间所发行的数字货币是纸质货币的另一种形式，由主权国家央行发行，具有国家信用要素和纸质货币相同的法定特性。我认为，IPV9 作为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条件日益成熟。

第一，IPV9 能实现数字货币地址加密。中国拥有支持 2.256-2048

之间的金融根域名服务器和支持北斗 L 网络设施域名服务器，拥有自主产权 .chn 的国家域名服务器。

第二，法律层面，IPV9 网络层面的法律货币体



系，具有国家在第五疆域行使货币主权，发行、管理、记录、溯源及方便使用等特点。IPV9 的法律主体归属中国，IPV9 的文本著作权及网络上运行的数字货币法律归属权均属于中国。此外，加密深层的 IPV9 地址空间可满足今后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第三，安全层面，与纸质人民币一样，IPV9 网络能对采用其地址空间的 IP 地址进行加密，解决了对数字货币发行 IP 地址加密的世界难题。基于 IPV6、IPV4 实现的数字现金是在美国接入网、在中国的应用，发行的数字货币是美国主权下的延伸应用。而且基于应用层设置的数字现金，无法确定发行和运营过程中正式的真实地理地址与虚拟物理地址重叠，所以发行的数字货币是无地理属性和真实使用单位、真实法定物理属性，是不能作为法定数字现金的。

IPV9 作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实施方法，首先要在现有网络的基础上采用中国 n 金融跟域名服务器，IPV9 地址空间组建 IPV9 金融专网，从事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国家主权。将法定数字货币和金融系统纳入 IPV9 金融专网。

以上是我们研讨的初步方案，还有许多环节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但我们认为采用 IPV9 作为

锚的数字货币是未来世界各国货币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用好资本市场， 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 邱晓华 /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邱晓华

得益于对内持续深化改革，对外实施顺应全球化的开放型政策，内外联动催生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要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三个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变了。中国由一个短缺的市场发展到了一个相对富裕的市场，因而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一个矛盾，就是如何拓展市场，如何进一步把生产的东西卖出去。

第二，成本变了。成本的不断上升造成实体经济效益下降，成本侵蚀利润的现象日益突出，实体经济陷入了低盈利甚至是无盈利的困难状态。

第三，环境变了。中国在前几十年的发展中，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之路，因此造成了空气、水、土壤的污染。环境成本给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第四，资源变了。资源逐渐处于瓶颈状态，再搞大量消耗资源的发展之路越来越困难，高消耗的产业

也遇到了更多挑战。

第五，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招工难、招工贵等新压力。

第六，由于地方政府、部分企业的负债率不断上升，造成中观、微观层面的发展能力受到限制。

上述六个方面的变化，说明中国实体经济进入了爬坡过坎的困难阶段。但2010年以来，在不断应对上述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取得了积极进展。突出表现就是传统产业加速转型、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一个以质量进一步改善、效率进一步提升、老百姓福祉进一步增进、环境进一步美化、结构进一步优化，增长相对平稳的新阶段正在向我们走来。同时，资本市场的春天也即将到来，展现出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战略需要资本市场协同配合。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是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预见，资本市场在这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会更加关注、呵护和支持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二，企业需要资本市场。企业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负债率高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因此资本市场在下一阶段也将进一步助力中国企业。

第三，老百姓需要资本市场。增进民众福祉，不断提升老百姓的财富，就需要有更多专业机构、专业人士提供更便利的理财服务，以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第四，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持续推进的大事，这也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要不断对外开放，一国市场将变成多国市场，乃至变成全球市场。因此，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比重会日益增加，不断为中国资本市场注入新活力。

此外，金融科技也将极大地改变传统金融业态，为中国资本市场增添新动力。基于此，下一阶段中国资本市场需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着力解决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的问题。要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

用好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89
邱晓华，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改革建立可持续的金融体制，支持经济发展	91
王 沅，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创造良好生态环境，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93
邱亿通，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开放”依然是金融发展的重要课题	95
George Kanaan，阿拉伯银行家协会 CEO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首先要解决好五大根本性问题	96
孙轶颀，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可持续金融项目总监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险业须坚守好风险保障功能	97
张宗韬，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进一步淘汰不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上市公司，把落后、低效、僵尸的上市公司清出资本市场，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

第二，要下大力气优化上市公司的结构。要不断扩展高新企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等新产业尽快进入资本市场，优化中国资本市场的结构。

第三，要大力提升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中国的上市公司平均回报股息分红率不足 2%，对投资者的回报远远不够。

第四，要进一步协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制。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相对分散，下一阶段要大力协同央行、证券、保险、金融、银监会、财政等机构，形成真正统一协调的新管理体制，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以改革建立可持续的金融体制，支持经济发展

■ 王沅 /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王沅

从银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讨论，需要明确的是银行应该如何支持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只是一个经济类别，经济体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别，同样需要金融支持。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中，在经济发展中，银行和资本市场提供了重大支持。

为经济改革提供资金支持。中国长期以来以间接融资为主。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银行提供的基本都是流动性资金贷款，几乎没有长期投资。长期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长期投资，基本上都来自于国家预算拨款。想要获得高速发展，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还是要靠银行的大额贷款，或者是资本市场的融资。这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大力改革的一个层面。目前，中国已经有了长足进步，银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

银行发挥着增信作用。中国的主要大行都是国有银行，成为上市公司后，国家仍然是大股东。企业从银行借贷到资金，不仅仅是拿到了钱，实际上也是非

常重要的增信。企业要发行债券，评级公司首先看的就是银行借贷能力，如果从银行借不到钱，评级就会下降，发行债券就更不容易，成本也会提高。国际融资看企业的信誉度，首先要看的也是“你是哪家大银行的客户”，如果从所有银行都借不到钱，大家就会对公司信誉打一个问号。

在支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银行系统也经历了多轮改革。从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上市公司，可谓日新月异，用 20 多年改出了一个全新的银行体制。当然，其中还有许多空白点，或者说不足需要继续加以改进。

首先是业务方式比较传统。国有银行习惯打交道的客户大都是国营企业，业务方式相对比较传统。比如贷款时，大银行依然是“坐商”，坐等客户上门。但理论上来讲，无论银行大小，都应该追逐最好的客户。大银行也要主动与优质客户保持联系，主动提供创新的金融产品，而不都是一般性信贷。目前中国的银行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大银行做得甚至还不如小银行，不如股份制银行，不如私有资本进入的银行。

其次是银行或金融系统存在内部循环。这也是大家诟病银行比较多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资本运作，银行将吸收来的储蓄卖理财，理财又间接进入资本市场，钱根本不出金融体系。造成这种乱象的背后，除了内在动力，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出于地方降低大量失业风险、保护国营企业的需要，银行不得不为一些落后产能提供金融支持，但很多银行也是上市公司，有盈利的要求，最终就出现了各种影子银行追逐高利润，在账面上变成一个盈利的银行。

第三是银行类别还需要进一步多样化。不仅应该有工、农、中、建、交等国有大行，还要有招商、民生这种股份制银行，有小额信贷公司，这样才能在一个非常完整的框架内把各个层次、各个层级类别的客户的融资需要都包容进去。

最后是各类银行间要加强协同发展。金融业是一个协同发展的行业，银行不可以独善其身，只做自己



的业务，需要互相协同。比如国家开发银行是做基础设施融资的大银行，但也做小额信贷，是一个批发性银行，把钱批发给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让他们去找自己熟悉的中小企业甚至个体贷款，最小的单项贷款额可能只有 5000~10000 元。大银行做不到这一点，也没有这样的人力，所以就通过跟其他银行进行合作，用批发的方式来带动零售。

在当前的形势下，金融要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还需要下大力气把整个政策框架、监管框架、金融机构的运作框架制定好。但我认为，如果希望金融体系可持续地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无论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还是实体经济、高科技产业，首先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改革，市场要进一步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我觉得金融体系也要在改革、开放这个轨道上发展，才有前途。最近证监会也宣布，将大幅放宽外资入股证券、基金等行业的限制，允许外资持股比例达到 51%，原来证券等金融服务的外资持股占比都不允许超过 20%。未来，开放外资、国内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是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向。加强改革，建立多层

级、多类别，又可以相互交易、互相协同的金融体制，这样一个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金融体制才能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支持。

创造良好生态环境， 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 邱亿通 / 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邱亿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是金融工作要坚持的总原则，广州市委提出建设“三中心一体系”，其中“一体系”就是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服务，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这几年广州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建设金融功能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集聚效应。目前，我们已经建设了六个大的金融功能区。一是打造民间金融街，这也是全国首条民间金融街。广州、珠三角的民间金融聚集了大量财富，也相当活跃，民间金融街就发挥集聚民间资本、规范民间金融活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功能。到目前为止，民间金融街聚集了各类机构 260 家、民间资本 350 家。二是在珠江新城旁边，规划建设广州国际金融城，现在起步期 1.3

平方公里正在建设中。三是依托广州开发区，建设广州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区，主要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四是建设南沙跨境金融服务区，开展跨境金融服务。五是在增城建设广州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和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服务广州和珠三角。六是在花都布局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是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绿色产业提供融资服务，同时也利用金融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第二，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首先是支持企业上市，利用好主板和新三板两个资本市场。现在广州的上市公司累计有 152 家，总市值 2.43 万亿元，今年新增 19 家，是近年来增加最多的一年。通过上市，为全市各类企业提供融资超过 3000 亿。新三板挂牌企业 449 家，今年新增 101 家。

同时，广州还建设了自己的企业股权交易平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辐射半径，突破主板市场门槛比较高，一般企业进入比较难的瓶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目前，股权交易中心的挂牌企业已经超过 7000 家。

第三，加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发展，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市场。广州创投风投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全市各类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私募基金机构从 2012 年的不超

过 200 家、管理资金规模不到 300 亿，迅速发展到目前机构 3200 多家、管理资金超过 7000 亿。而且各种风投创投活动很活跃，我们提出要打造中国风险投资之都。

第四，发展普惠金融，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首先是引导广州市的银行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针对中小微企业，开发小额信用贷、创业贷、网贷通等创新型信贷产品。其次是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

引导广州市的银行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针对中小微企业，开发小额信用贷、创业贷、网贷通等创新型信贷产品。其次是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积极利用新兴金融业态，包括小额贷、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互联网金融等，弥补传统金融机构、传统融资手段的不足。



积极利用新兴金融业态，包括小额贷、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互联网金融等，弥补传统金融机构、传统融资手段的不足。最后是探索开展政策性小贷保证保险，创新引入保险机制，服务中小微企业。目前，这种机制在中国还带有探索的性质。

第五，开展各类型融资对接和路演活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单是中小微企业，很多大企业，也普遍存在融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银行不知道好项目在哪里，企业也不知道怎样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融资手段。作为地方金融主管部门，我们搭建平台，开展活动，畅通信息，搭起金融机构跟企业之间畅通的融资途径。

第六，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广州设立了市工业转型升级母基金，以 15 亿的政府引导基金撬动 360 亿的金融资本，支持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像这样的基金市里有好几只。

第七，加强金融风险防控，营造服务实体经济的良好环境。从 2016 年开始，广州金融工作局着手开发金融风险的监测防控平台系统，2017 年 4 月份已经正式运作，并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地方金融风险预警防控中心。这个中心依托平台和系统，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特别是新兴金融机构的监管。特别是对互联网金融，广州金融工作局通过建立防控平台、防控系统，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所

以在门槛上就可以相对降低甚至是零门槛。比如，在一线城市中，广州目前还是唯一放开股权投资机构审批，可以直接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城市。

对金融业来讲，要不忘初心，回归本原，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同时也要牢记使命，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让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开放”依然是金融发展的重要课题

■ George Kanaan / 阿拉伯银行家协会CEO



George Kanaan

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很多人可能会把资本市场作为一个投机工具，这就创造了泡沫，带来了很大的问题。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投机带来的泡沫所导致的。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趋向于保守。因此，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一些问题需要重视。

很多人都在讲开放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很多国家也都在努力去开放，包括开放金融行业。但在各领域各行业的开放过程中，金融行业的开放是最困难、最不容易实现的。

阿拉伯银行家协会就中国金融业进行了一项课题研究，每年都会专门发表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文章。最近的一篇文章就提到，中国银行业、金融业是十分复杂的，阿拉伯的一些银行和企业不能够低估与中国企业、中国银行业打交道过程中的挑战，彼此之间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

阿拉伯银行业是一个很大的行业，但在中国市场的业务还非常小，目前想要在中国开银行也很难落地。我认为，让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土银行把业务做得更好，为更多的经济领域提供服务，因为外资银行的视角与本土银行会不一样。比如什么样的客户愿意去借贷，或者服务什么样的客户。目前在阿拉伯世界，就有专门为穆斯林人提供服务的银行。穆斯林群体在和银行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他们自己的方式，比如说不收利息。在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有专门的银行机构面向穆斯林客户提供服务。我觉得中国的银行业也可以吸收这种类型的投资，专门面向穆斯林客户提供服务。

另外，小微贷款大家也非常关注，但具体执行情况不容乐观。我觉得，小微贷款会是接下来的时间里一个非常大的发展重点，其实就是给穷人借钱，这些人恰恰是需要帮扶的对象，他们更迫切地希望有更多的机构能够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说到阿拉伯世界，大家就觉得是极端主义或者不稳定、政治动荡，但阿拉伯世界不完全是这样，也有很多

好的事情。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外资银行太少了，作为一家银行业协会，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国外的银行到阿拉伯世界投资，当然也希望把中国的银行带到阿拉伯世界。目前中国银行业已经在阿拉伯世界逐步开展业务，但还是太少了。我们相信，随着

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双边贸易的大大提升，肯定需要更多资金的支持，希望中资银行在阿拉伯开放更多网点。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首先要解决好五大根本性问题

■ 孙轶颀 /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可持续金融项目总监



孙轶颀

对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我认为，首先要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解决好。

第一，要明确实体经济的概念和范围。投资项目可以总结为三种，第一种是行业市场化成熟度很高的；第二种是公益性很强，靠财政投入的项目；第三种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一种投资项目银行会很乐意借钱，我们不讨论，第二种也不需要讨论。唯有第三种，是我们关心的。是不是这类项目都要支持？不一定。我认为优先考虑的项目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一是技术先进，属于世界前沿、全球领先；二是有创新性；三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重大影响；四是具有地方特点。我觉得，可以对需要金融优先支持的实体经济列一个行业清单，列一个标准，供银行业参考。定好了范围和标准，有了目标，才能配以相应的金融手段和政策支持。

第二，“打铁还需自身硬”，实体经济自身要创新，要不断提高发展质量。金融不是搞扶贫，也不是做公益，要考虑项目的商业性、风险的可控性。技术成熟、商业模式、市场前景，至少占一项，金融才会感兴趣。

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国家有很多税收优惠和财政补

贴，但是有一些企业就拿去增加现金流，“美化”财务报表了，而很少拿来做资本运作、技术革新和长期发展，这样肯定是不符合条件的。所以，我觉得要特别突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第三，要拓宽融资渠道。现在一提融资就找银行，但银行有自己的局限，也有自己的困难和困境。比如说在农村地区，很多小的农业项目，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股份制银行等大银行根本没法进行投贷，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是农信社甚至更小的合作社机构。所以应增加中小金融机构，这样大银行、中银行、小银行，甚至更小的银行，互相补充，才能给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不同地区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

我建议实体经济可以根据项目的不同阶段、产业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项目初期是天使基金、风险投资；成熟一点了，私募可以进来，银行也敢贷了；再成熟了，才是资本市场，才是债务和股权融资。

第四，要做好基础性工作。主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一是信息管理和大数据分。二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的信用体系建设。为什么也要提政府呢？因为政府的信用、借贷能力、发债能力、对一些承诺的责任，也是撬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关键。现在 PPP 项目落地、成功的很少，原因就是公有基金和私人资本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所以这一点要加强。三是不断地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四是建立鼓励创新、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

第五，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和配合。政府的作用是定游戏规则，划好红线，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经营环境，吸引国内外的金融机构进去，然后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让金融机构按照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进行合理决策。对于那些必须支持的实体经济，政府可以给予必要的财政、财税支持。

以上五个方面，是我认为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得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险业须坚守好风险保障功能

■ 张宗韬 / 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宗韬

保险业应该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我想通过三个关键词，分享一下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第一个关键词是定位。保险要支持实体经济，首先是解决自身的定位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保险公司弱化保险的保障功能，反而强调一些投资型保险，这就脱离了保险的本质，它的基本功能是风险保障和管理。

保险在金融业有自己的独特功能和天然使命，其他金融领域大部分是解决资产端的问题，而保险更重要的是解决负债端的问题，是减少负债的不确定性，降低波动的风险，提升运行的平稳性。所以常说，保险是经济“减振器”和社会“稳定器”。我觉得，服务实体经济首先要把保险的定位理清楚，最近监管方面也一直在强调“保险”姓“保”，我想就是在强调保障功能。

第二个关键词是升级。整个保险业，尤其是财产保险应该充分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升级。

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对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这几年企业财产保险基本上是零增长、负增长，已经从财产保险中的第二大险种降到了排名第三，甚至第四。保险起源的产品——船舶、

货运险，这几年基本上也是零增长、负增长。反而是居民个人的产品和一些有政府支持的产品增长非常快。像针对居民个人的家财险、意外险、健康险，还有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动的农险、责任险。现在农险已经成为第二大险种，监管部门预测的规模是 800 亿元，更乐观的估计是到 2020 年能达到 1000 亿。产品责任、职业责任、医师责任、会计师责任、公众责任等责任险也增长非常快。从此就能看出，经济对于保险的影响非常大，整个保险行业与经济是共生共长的关系，保险要服务实体经济，必须抓住产业升级带来的机会。

第三个关键词是补短。要弥补保险的短板，我觉得中国保险业的核心短板是保障功能不足。

一些大的自然灾害中，保险赔付占经济损失的比重基本不超过 10%，而美国的安德鲁飓风保险赔付占 60%，国际一般是 30%。中国寿险的人均保单只有 0.09 张，基本上相当于 10 个人才有一张保单，而美国是我们的 10 倍，日本是 17 倍。

另外，从反映保障程度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来看，中国的保险业也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就是指人均保费，我国基本上是 230 多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超过 600 美元，发达国家平均是 3000 美元以上。保险深度也就是保费占 GDP 的比重，我国大概是 3.2%，世界平均水平是 6%，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 12%。

因此，我认为保险业不需要偏离自己的本业，过分强调投资属性，坚持自己的功能定位，承担好自己的天然使命，发挥自己的独特功能，也能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为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中美关系良好发展将带动双方经济、金融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 周延礼 /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



周延礼

中美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因为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意味着共同利益是中美发展健康友好关系的出发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13 年 6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会晤；2017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也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7 年来到中国同习近平主席会晤。通过一系列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奠定了两国元首外交的基本框架，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中美两国良

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为双方开展经贸和金融合作铺平了道路。

目前中美两国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非常大。前不久（11 月 8-10 日）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了成功访问，双方签订了 2530 多亿贸易大单，为下一步的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我们充满希望。

我认为在金融领域，中美两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希望有更多的美国金融机构，无论是证券投资，还是银行保险都到中国来开办业务，不断拓展中美金融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总的看来，中美关系良好健康地发展将带动双方经济、金融合作不断走向深入。现在谈论中国赶超美国的话题好像很热，但其实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仍然很大。从经济总量来讲，美国的 GDP 是 18 万亿，中国的 GDP 是 12 万亿；从人均 GDP 来讲，美国是 50000 多美元，中国是 8000 多美元。仅从 GDP 来讲，中国要实现超越美国，道路就相当于漫长。另外，美国的科技研发一直处在世界前列，而中国的科技研发刚刚起步，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总而言之，中美应积极促进政治、经济和金融关系良好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双方在科技、能源、环保以及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关系深入健康地发展。

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国家和区域合作对话（1）

中美关系良好发展将带动双方经济、金融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周延礼，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

外资保险公司在中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郑 艺，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总裁暨首席执行官

加强中美沟通交流，促进实体、金融双向投资

王汉锋，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董事总经理

中美房地产投资概况及对中国投资人的几点建议

Dan Cashdan，美国 HFF 公司投资总裁

99

100

101

103

外资保险公司在中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 郑艺 /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总裁暨首席执行官



郑艺

我是做企业的，想从微观角度谈一下中美合作的一些个人体会。1992 年 AIG(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回到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中国政府批准的外资保险公司，紧接着 AIG 又在广东、深圳设立了两家分公司。AIG 应该是比较早来到中国经营的外资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为什么说 AIG 回到中国，而不是来到中国？因为 AIG 是 1919 年在上海成立，后来从上海走出去的金融保险公司。当年回到中国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资，AIG 是做金融保险的，要跟着我们的客户走。当年通用汽车到上海建厂，我们就跟着来了。这个过程也体现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是这样理解的。

AIG 回到中国后不断发展，从主要是外资客户扩大到内资客户，从国有企业扩大到民营企业。现在回过头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中国逐渐从一个纯资本输入国变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两年前中国输出的资本就已经超过了引入中国的外资数额，变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与此同时，中国很多国营和民营企业开始走出国门。

AIG 作为一个保险公司，肯定跟着客户走，所以我觉

得未来 AIG 有很大一块业务会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当然 AIG 也做一些个人险的业务，比如旅行保险。现在中国出国旅游的游客规模很大，2016 年达到 1.2 亿千万人次，这也是旅行保险的发展机遇。

现在全球化有一些“噪音”，但我个人认为全球化仍然是大趋势，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现在能够引领全球化的潮流。AIG 非常希望能够参与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希望能与中资保险公司一起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这方面，我认为 AIG 与中国保险企业的合作空间还很大。

讲到走出去，就离不开“一带一路”这一重要国家发展战略。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可预测的风险，所以我希望保险界能够协助中国企业规避这些风险。现在有很多成熟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是可以以为这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规避风险的。

中美经贸、金融方面的合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几天前(11 月 10 日)中国宣布将允许外资在国内券商、保险公司、资管公司以及期货公司的持股比例达到 51%。我觉得这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态度，是金融领域开放迈出的重要一步。

目前中国有 80 多家财产保险公司，其中有 22 家是外资的，AIG 是 22 家外资保险公司之一。我们与中资保险公司一起积极参与中国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美国商会最近对其会员公司的调查显示，77% 的会员公司在盈利，74% 的会员公司 2016 年营业额同比有增加，76% 的会员公司预计 2017 年营业额同比有增加，55% 的会员公司表示将继续增加在华投资规模。总体而言，美国商会的会员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相当积极的。可以说，美国企业还是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

在华南也有一个美国商会，我曾担任过荣誉董事，所以与他们有过很多接触，因而知道美商对中国还是相当看好的。我个人也非常看好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也衷心希金融界、保险界能够在助力中国企业、中国游客走出去，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中美经济贸易不断发展中做出我们的贡献。

加强中美沟通交流，促进实体、金融双向投资

■ 王汉锋 /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董事总经理



王汉锋

中美之间的交流一直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力量。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过去是，现在和未来依然是。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美国等世界先进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以世界先进国家为标杆，我相信对于中国的发展应该是有好处的。

我所在的中金公司一直积极参与中国实体、金融双向开放的进程。我结合自己的体会，简单讲一下目前中国实体和金融双向对内对外投资的主要特征，包括中国最近几年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和新特征以及经济增速从下行到逐渐稳定。

一、实体领域的投资

最近几年，在实体领域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外资对中国的投资。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现象，像韩国、日本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外投资就会超过本国吸引到的外资。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达到了 1700 亿美元，增速为 44%。中金公司对此做了一些研究，中国的海外企业并购虽然波折不断，但总体呈现积极向上的特征。具体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从行业来讲，中国之前并购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材料等一些初级行业里，但是从 2010 年之后，慢慢转向了消费、制造、科技等行业。第二，从地域来讲，中国之前参与并购的对象相对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是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并购标的所在地区慢慢移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三，从主导并购的主体讲，过去中国主导实施并购的主体大多是国企，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企在主导跨国并购。

综上所述，在实体领域，中国不再只是吸引外资，随着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市场的扩大，以及中国企业在价值链的地位从下游走向中上游的需求，有力推动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而且这一向上的趋势仍会继续。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投资在行业、地域以及主导并购的主体方面的特征，也将继续演进。

二、金融领域的投资

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投资，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依然大幅落后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应的水平。目前海外投资者在中国 A 股市场持有股票的总市值大约只有 1.1 万亿人民币，占中国 A 股市场的比例不到 2%。而且还是因为最近两年沪港通、深港通开放，外资明显加速发展之后的结果，这个外资量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不匹配。中国证监会 2002 年就推出了 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旨在吸引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但是 QFII 发展比较缓慢，直到最近才开始加速。

据中金公司估算，在未来 5 ~ 10 年金融领域的组合投资，无论是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者向海外的投资，年均都会超过万亿美元的规模。所以，我估计十年之后，海外投资者在中国 A 股的持股比例可能会接近 10%。即使是这样，也只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对应。

总体来讲，过去这些年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导致金融领域的双向投资，无论是海外对中国还是中国对海外的投资，都大幅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三、加强交流有利于促进投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根据过去这些年我参与双向投资的经历，我认为加强交流对于促进双方的投资与合作有非常大的帮助。2017 年年初我认识了一位非常资深的美国投资者，他是投资新兴市场债券的，但是在他过去 30 多年的投资职业生涯里，竟然一次都没有来到过中国。中国是新兴市场里面最大的一部分，但是他居然一次也没有来过。有不少海外投资者都像上述投资者一样，从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的所有认识和看法大多来源于海外媒体，而很多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全面客观。所以，要想真的读懂中国并做出正确的投资，还是要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要加强近距离交流沟通，才有利于消除误解加强了解与互信，从而有利于双向投资。

中美房地产投资概况及对中国投资人的几点建议

■ Dan Cashdan / 美国HFF公司投资总裁



Dan Cashdan

大约 5 年前中美房地产之间的大门打开了，中国投资人能够到美国投资房地产。中国投资人主要有以下三类：首先是国家投资人，主要是主权财富基金。这类投资人是专业的，他们在美国、欧洲都非常活跃，一般都会选择最好的标的。其次是一些机构投资，可能是保险公司，比如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等；也可能是银行或一些私企，比如万达。这些机构到全世界进行各类不同的投资，有些投资非常谨慎、非常保守，有些投资则非常积极。最后是高净值个人投资，他们一般专业性不高。

这些投资人到美国投资房地产，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行投资，另一种是在美国寻找合作伙伴共同投资。我认为后一种比较好，因为如果我到中国投资，可能会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做生意，毕竟到不熟悉的地方还是有本地人帮忙和给点意见比较靠谱。

怎样在美国找到符合政策的投资机会？我认为应该寻找那些有利于社会和人民的行业去投资，比如投资“一带一路”倡议。我还可以给大家几个建议：

一是投资科技的重要城市，比如说硅谷、波士顿、

洛杉矶等等。二是投资医疗行业。三是为解决赴美留学生的住宿问题投资。三是投资养老项目。美国老龄化非常迅速，中国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养老领域投资前景广阔。

具体投资过程，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应该找一个真正合格的美国咨询公司来帮助你。

第二，不要操之过急，要认真了解你的投资价值。

第三，要仔细考量投资项目是否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很大影响。

第四，要找一个高质量的合作伙伴。

总之，我觉得中美在很多领域都是有广泛合作空间的。现在很多讨论都在说中国要向美国学习经验，但我很少使用美国的聊天工具，我几乎每天都在微信上花很多的时间。我发现在很多技术领域，中国已经在扮演领军角色了，不管是在社交媒体还是高端科技领域，美国都有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题为《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的主旨演讲指出，第一继续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努力实现互利共赢；第二，继续谋求创新增长，挖掘发展新动能；第三，继续加强互联互通，实现联动发展；第四，继续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美国也同样相信并支持这四个目标。

中欧贸易投资领域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前景

■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法国前财长、欧洲50集团主席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进而实现双赢合作。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应该是基于互利互惠与平等，涉及网络空间的保护与治理、可持续发展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

我们再来看看中欧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能够真正实现中欧更好的合作与交流。中国现在经济面整体向好，这是我们所乐见的。因为中国经济稳健增长，就会有更多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也会扩大，这样更有利于中欧经贸合作。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在进一步完善和开放金融市场，受到普遍欢迎，但我认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十分重要。现在世界各地的货币政策协调性还不够，所以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

2017年6月，中国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首次落实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消减了外资准入限制，扩大了中国在很多行业和领域对外开放的范围和程度。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中国需要国际投资，以保持吸引力。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政府继续推行开放政策，希望能逐步取消对外资的限制，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更好，也使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更加稳健。

关于中欧贸易平衡问题，其实很多欧洲投资人非常希望扩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毕竟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零售业市场。为了创建中欧互信友好的投资环境，我觉得有两件事需要解决。第一，虽然欧元区已经成功从金融危机中解脱出来，经济增长也已有所恢复，但欧盟还需增强信心，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欧盟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更吸引中国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才能让他们对欧洲市场更有信心。第二，我也想重申欧盟对于中国的重视，我们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者。2012年建立的投资框架《中欧投资协议》，以及11个欧盟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了欧盟对中国的重视，当然也对欧盟自身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目前欧洲的金融机构已在中国的八个省份进行了相关投资，我们对于这样的投资非常有信心，对中欧未来的交流合作也非常乐观。我们相信中欧双方已经意识到了面临的挑战，同时双方也已经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我们相信双方一定能够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国家和区域合作对话（2）

中欧贸易投资领域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前景	105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国际金融论坛 (IFF) 副主席、法国前财长、欧洲 50 集团主席	
要以超前的、动态的眼光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06
王 沅，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从宏观、微观等多个角度看“一带一路”以及中欧贸易和投资	107
夏 乐，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借人民币国际化东风，开拓中欧贸易新市场	109
吴建新，神泉能源油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110
贲圣林，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执行所长	

要以超前的、动态的眼光看待 中欧经贸关系

■ 王沅 /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王沅

我认为从整体来讲，中国、欧盟和英国在未来几年当中，经贸关系都会是良好的。首先因为中国、欧盟、英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强。这是经济合作的基础。虽然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欧洲出现了难民潮，欧元区也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这几年经济也有放缓的趋势。但在调整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有时候会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我觉得这才是中欧包括英国在解决贸易和投资问题时，真正需要注意避免的问题。

在经贸合作中，要以超前的、动态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出现某一种现象，就下结论说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好了，国外撤资了，这是简单的武断。我们应该积极的、前瞻性地看待中欧经贸合作。另外中国和欧盟在金融领域的合作空间也很大，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到欧洲市场做联合融资，或者去发行中国的债券，实际上是中国单向到欧洲融资。现在中国也可以参与到全球融资，作为主动向外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欧盟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商业合同的融资方式，仍然是今后中欧长期合作的基础。毕竟信用的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跟欧盟的合作，不但是与欧盟整体，在欧盟内部，我们也提出来一些新的合作方式，比如“16+1”新型合作方式。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仅是国际上对中国的政策会有一些政治化

过度解读，有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对国家提出的前瞻性的、方向性的，战略性的决策，也习惯政治化解读，这给经贸实际工作造成了一些障碍。

还有一个在经贸合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互相指责。西方或欧盟方面会指责中国有很多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中国刚加入 WTO 的时候，外资的待遇远远高于中资的待遇，中国企业抱怨外国人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因为当时地方政府希望能吸引到外资，但是现在不缺资金，又要保护本地企业，于是有些地方对外资的态度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十九大提出，中国仍然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还要起到引领作用。我认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已经超过了外资向中国国内的投资额。我们对于来自境外的投资没有以前那样迫切了，是不是就不需要给外资国民待遇了呢？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审慎决策。我们走出去，也希望别人公平以待，我觉得做所有事情要公平对待。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经贸往来中经常谈到的问题。对于专利技术应该尊重和保护，不应该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复制生产。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我们也开始带着很多专利技术走到其他国家，也希望能得到当地法律的合理保护。所以我觉得在国际合作中，无论是与哪个国家合作，也无论是多边合作还是双边合作，都应该用对等、公平的原则，要避免政治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日益清晰明确。比如，最近证监会、保监会拟提高外资在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将证券行业外资最高持股比例从 20% 提高到 51%；保险机构外资持股的最高比例是 50%，说明保险行业相对是最为开放的行业，现在保险机构外资持股也可以达到 51%。像这样的开放措施，会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放宽外资持股比例至 51%，是国内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明确风向标。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还是和全球贸易伙伴长期互利互惠交流与合作，都有赖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对外开放。

从宏观、微观等多个角度看“一带一路” 以及中欧贸易和投资

■ 夏乐 / 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夏乐

一、中欧贸易问题

讨论中欧贸易问题，我有一定优势。因为我本人任职一家西班牙银行，在我过去工作过的六七年时间里，接触到很多欧洲客户，经历或听到过很多他们在中国投资的故事。我本人又是做经济分析的，所以我希望从宏观理性的角度，穿插微观感性的个人经历和感受，跟大家多角度分享中欧贸易和投资关系。

最近全球出现了一轮比较同步的经济复苏。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更能说明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了。当我看到中国经济复苏数据的时候，我跟我的同事说中国经济复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益于欧洲和美国的进口向好。我问他，你们欧洲复苏又是因为什么？他查了一下数据（西班牙对外银行 BBVA 在欧洲有很强的研究部门）后说，是因为欧洲对中国的出口增多了。我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家都把复苏的功劳推给对方。由此我深刻的体会到，自由贸易带来的互利互惠让每一方都变得更好。

很不幸的是，在全球普遍复苏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2017 年 8 月 14 日，美国宣布正式对中国

发起“301 调查”（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的俗称），这个调查的期限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应该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发起“301 调查”，过去曾对欧盟的成员国使用过该调查。如果希望保持自由贸易，中欧需要携手合作。这次的经济复苏，还让我有一个特别感受就是全球经济三分天下的体系已经形成了，中国、美国、欧洲三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如果美国出于自身一些政治上的原因退出自由贸易体系的话，那么中国和欧洲的选择对全球经济贸易来讲非常关键，如果中欧能继续坚持自由贸易，我们还有机会看到下一轮全球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如果中欧也和美国一样，倒退回所谓的国家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的话，将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

在中国和欧盟的双边贸易中，我观察到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地方。中国对欧盟的贸易存在大量的顺差，这在双边贸易谈判中，经常被欧盟引用来与中国讨价还价。但中国对欧盟贸易的顺差在欧盟内部是不均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在 2016 年中国与德国的进出口贸易中，中国的出口额是 652 亿美元，从德国的进口额是 861 亿美元，这意味德国贸易顺差 209 亿美元，而中国贸易逆差 209 亿美元。用这组数据对比中国与欧盟贸易的顺差 1930 亿美元，我们会发现虽然中国对整个欧盟是贸易顺差，但具体到欧盟的每一个国家不一定是顺差，有可能是逆差。这导致中国在与欧盟的谈判过程中有时感到很困惑，到底谁能代表欧盟？没办法找到明确的欧盟代表人物或代表国家，来跟它们直接谈判。这又涉及最近备受关注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欧盟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立场有所反复。在欧盟内部，德国明确表示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很遗憾德国执行的法律是欧盟制定。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中，这实在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未来，要想让中国和欧盟的贸易磋商能够顺利进行，我认为不单单是中国方面要做出努力、要进行调整，欧盟方面也要做出调整 and 改变。至少就我所知西班牙希望德国能够



对自己的经济做一些结构性调整。现在德国对外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其 GDP 的 8%，但是德国说它是欧元区中的一个经济体，要看整个欧元区的顺差是多少。所以我要再次强调，不单单中国方面需要调整，欧盟方面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变革，比如建立银行联盟也是调整的一个举措。

二、中欧投资问题

我用我观察到的一个实例讲一讲欧洲人在中国投资的新现象。我会出席一些欧洲投资者在中国进行较大投资的见面会，讨论一下贸易问题。今年，我碰到一家做鸭饲料的丹麦公司老总。我说一些外商反映中国现在的营商环境有所恶化，你在中国感受怎样？他说感觉还不错。我说现在外商在中国投资，感到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是个严重问题，你怎么感觉还不错？他说：“我们公司是做鸭子饲料的，公司规模非常大。你知道中国一天消费多少只鸭子？400 万只！这个数字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我只有留在中国贴近我的客户，才能配出最好的鸭子饲料，才能更好地服务我的客户。”他的故事促使我又着意了解其他外国投资者，发现现在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前中国招商引资，外商大多看重的是中国便宜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他们在中国投资建厂，招募中国工人帮他们组装产品然后出口，产品的消费市场并不在中国。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外商投资关注是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我们必须及时、深刻地认

识到这一变化，以便在相关政策制定以及贸易往来中加以注意。如果外商投资中国不再只是想利用便宜的劳动力成本，而是有另外要求，那么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等投资协议的时候，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都应有所变化。中国和欧洲进行谈判的时候，也应认识到这一点。

三、关于“一带一路”

2017 年 6 月 17 日，国际金融论坛（IFF）在广州举办的丝路联盟大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当时有一位演讲嘉宾提出，中国应该考虑加入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公约——《华盛顿公约》。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发生冲突时适用的法律，更多是冲突发生地的法律或者中国的法律，中国对国际仲裁不是很感兴趣。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的一些欧洲朋友既感到兴奋又有点恐惧。他们说，中国投资那么多钱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到底想怎么样？我给他们解释说，中国首先是想通过“一带一路”融入世界，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磨合，了解彼此的经济、文化、法律。中国目前阶段是希望通过建立“一带一路”这个平台，与世界连接，与其他国家互联互通。至于中国未来的宏远目标，投资人暂时不必担心。

借人民币国际化东风， 开拓中欧贸易新市场

■ 吴建新 / 神泉能源油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建新

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中欧贸易和中欧金融。

第一，中欧贸易新市场——非洲贸易的机会。我是做贸易出身，20 世纪 80 年代把中国的产品卖到欧洲去，又把欧洲的优质产品带到中国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大宗商品原材料的需求不断提升，然而很多中国需要的原材料欧洲并不出产。很多原材料的产地在欧洲的殖民地——非洲，因而这里成为我们投资的天堂。但现在非洲其实还处于早期开发阶段，贸易往来的交易方式还非常原始，基本都是用现金交易，而且现金的数量经常很大，通常都是一两百万、两三百万美金。中欧在非洲有很好的合作。因为欧洲人有殖民地管理的经历，也因此积累了管理经验，所以中国人可以依赖他们

寻找可靠的项目和机会，甚至请他们做管理。中方这边提供资金和销售市场。中欧在非洲发展贸易和金融服务机会很大，比如现在贸易往来都是用美元结算，如果中国在非洲的贸易能够以人民币结算，将非常有利于人民

币国际化。

第二，中欧金融合作创新——债券市场战略机会。其实在 2010 年之前，中国的债券市场很少在国际资本流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还未对外开放。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外汇储备的上升，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这几年顺应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也建立了一些境外人民币结算试点。

2009 年 7 月 6 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城市仅有上海、广州、深圳、东莞、珠海 5 个城市。2010 年 6 月 22 日，试点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等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13 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客观上要求中国和其他国家在金融市场实现互联互通，而债券市场是潜在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近几年，我们公司在欧洲也建立了投行团队，合伙人都是银行家、资深律师，为企业和政府提供金融服务。现在我们的团队与中国几个大的投行一起，筹备为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等一些欧洲国家和企业发行境内人民币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命名为熊猫债券，与日本的“武士债券”、美国的“扬基债券”一样都属于外国债券。

总之，我建议中欧贸易合作不仅局限在中国和欧洲两个经济体，在新的增长地区——非洲大陆也有很多的机会。中欧应该紧密合作，学习欧洲的经验，少走弯路，实现共赢。

与此同时，建议中欧金融创新借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东风，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关注和参与，大家加强合作，继往开来。

我建议中欧贸易合作不仅局限在中国和欧洲两个经济体，在新的增长地区——非洲大陆也有很多的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 贲圣林 /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执行所长



贲圣林

我觉得“一带一路”应该是世界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但“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65 个，土地总面积 5000 万平方公里，占世界 39%；总人口 46 亿，占世界 62%；GDP 总量 23 万亿美元，占世界 31%。“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总体来讲，在经济贸易以及金融上都不够发达。

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详细数据的有 49 个国家，其中有约 40 个国家的国内金融系统不能够给本国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信贷支撑。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帮助这些国家，在金融领域与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然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以外的 64 个国家中，只有 26 个国家设有中国银行的分行，只有 20 个国家有中国的保险公司或者银行的

代表处。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欧洲也可以参与“一带一路”金融领域建设，并发挥积极作用。因为“一带一路”市场大、机遇多，但缺资金、缺人才、缺先进的银行和保险系统。而欧洲有世界一流的银行和保险系统，有人才、有资金，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领域缺乏的很多东西。当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人口上讲，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金融科技市场，也是全球该领域的领先者。目前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科技发展还比较落后，主要是资金不够，但它们是金融科技革命的沃土，具有很大发展潜力。中国可以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分享金融科技发展的经验。

如果中欧能够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金融服务和最新科技支持，“一带一路”将会在经济金融领域实现包容性普惠发展。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欧洲应该关心“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的“一带”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不论从地理上还是历史上讲，“一带一路”都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的连接之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的邻国，也是欧洲的邻国。中国有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中东、中亚、东欧国家出现问题也会影响欧洲。所以“一带一路”发

展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欧洲的，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目前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科技发展还比较落后，主要是资金不够，但它们是金融科技革命的沃土，具有很大发展潜力。中国可以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分享金融科技发展的经验。

国家和地区合作对话（3）

紧抓大湾区发展契机，积极推动韩中两国交流与合作	112
韩升洙，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加强中韩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共同推进大湾区发展	113
余利明，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未来中韩两国有巨大合作空间的主要领域	114
刘少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围绕“一带一路”谈中韩经贸发展	115
赵 萍，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部主任	
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中韩经济合作	117
Choi Suhyun，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前主席	
韩国基金市场状况及中韩私募基金的合作前景	118
Choi Gwangseok，KCN 投资公司副总裁	

紧抓大湾区发展契机，积极推动韩中两国交流与合作

■ 韩升洙 /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今年是韩中建交 25 周年，在超越 2000 年交流的历史长河当中，韩中两国人民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相似，总是感觉到十分亲近。1992 年 8 月，韩中正式建交以来，关闭许久的两国交流之门一经打开，两国关系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韩中两国的贸易规模，从 1992 年建交之初的 63 亿美元，发展到 2016 年的 2113 亿美元，增长了 33 倍多，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对象国，每年两国互访人数超过了 800 万人次，以韩流、汉风主打双向文化交流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韩中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建立了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并在国际事务各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

我认为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广泛紧密合作关系，韩中两国在资本市场的交流与合作还不够活跃，我想今后以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为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契机，积极探索韩中两国资本市场在大湾区尤其是广州南沙的共同合作发展。目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实体经济领域成为了世界最强，这与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经济地位还是不太相符的。在以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下，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主导着全球市场，牵制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影响力的扩大，对此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之下，中国正在努力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等举措，在全球金融资本市场夹缝中创造新的秩序。11 月 10 日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宣布中国政府将允许外资在国内券商、保险公司、资管公司以及期货公司的持股比例达到 51%。我个人认为，韩中两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当中，以韩国长期以来在资本市场积累的各种经验为基础，共同创建韩中资本市场良好合作的模式，将非常有助于促进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我非常期待韩中两国能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国际金融论坛 (IFF) 将南方总部落户广州南沙的契机，广泛开展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中国金融市场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在以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下，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主导着全球市场，牵制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影响力的扩大，对此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加强中韩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共同推进大湾区发展

■ 余利明 / 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余利明

关于在大湾区进行中韩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我谈几点看法。

韩国领土面积有 10 万平方公里，人口 5200 万，2016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是 1.4 万亿美元。韩国的面积和人口与中国浙江省相当，经济总量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当，位列世界第 11 位。韩国是世界经济 15 强，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增速仅落后于中国和印度。从 2010 年到 2016 年，韩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3.48%，GDP 总量从世界排名第 15 上升到了第 11 名。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调高了韩国 2017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预计年经济增长率为 3.2%。

韩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10%。韩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是出口到中国。韩国平均每年入境的外国人中，有约 47% 是中国人。2016 年，韩国对华投资 48 亿美元，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国。韩国也是第一个和中国签订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最近续签了该协议，规模为 560 亿美元。从狭义讲，韩国不属于“一带一路”沿线的 65 个国家；

从广义看，韩国明确表态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以韩国是“一带一路”的参与国。

在目前形势下，我个人认为中韩应首先加强政治互信、加强友好对话与磋商，最大程度求同存异，在变化的国际发展环境中找到不变的合作主线，实现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与韩国欧亚计划战略。

在贸易方面，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最大的逆差国，2016 年逆差接近中国和法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韩的贸易额是美韩的两倍，韩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超过了韩国向美国和香港出口额之和。在韩国向中国大陆出口的产品中，集成电路出口额排第一位，其次是手机的液晶屏。中国从韩国进口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元器件，经过中国加工组装成为成品后，又运回到了韩国。这说明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奠定了中韩两国贸易基础，韩车、韩风、韩流在中国大行其道，实际上源于两国贸易结构的契合。从这个角度讲，中韩应继续扩大贸易规模、改善贸易结构、共谋合作共赢。

在投资连通方面，除巩固双方的投资之外，中韩两国可以利用双方在公路、铁路、口岸、航空、电信网络、船舶、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以及重工方面的技术和资本优势，在全球尤其是美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联合投资。这样可以减少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摩擦，比如，如果是一个中韩联合体在美国投资基础设施，审查就比较容易通过，项目落实以及取得预期经济效益的成功率就高。

在金融合作方面，基于双方长期合作考虑，应该扩大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合作的途径，加强双方经济交往过程中的货币安全，增加捍卫各自金融安全 and 经济利益的内在能力。

未来中韩两国有巨大合作空间的主要领域

■ 刘少波 /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少波

未来中韩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合作：

第一，韩国经济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步发展，短短几十年时间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全球高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个过程中，韩国通过创新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做得很成功。我关注的是，韩国的金融是怎么服务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创新结构的调整转型升级的。据我所知，韩国的资本市场主要依赖银行体系，而从理论上讲，银行体系很难适应创新的金融需求。韩国在金融结构调整、服务创新转型升级方面到底有些什么经验可供中国借鉴，中韩可以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和交流。

第二，中韩双方可以在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中韩之间的贸易量非常大，这与双方在跨境人民币业务方面不是很匹配。比如说，从 2009 年到 2016 年 6 月末，中国与 236 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业务，其中香港特区占 54.9%，新加坡占 10.2%，中国台湾占 5%，日本占 3.2%，德国 3%，英国 2.2%，澳门特区占 2%，美国占 1.9%，而韩国只占 1.7%。人民币的跨境收付业务相较于中韩之间的贸易量来讲，还有

很大的扩展空间。具体到广东省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韩国所占比例也不大，占比最多的还是香港特区，达到了 70.2%，中国台湾占 6.6%，澳门占 3.2%，英国占 1.6%，韩国仅占 1.5%。从以上数据来看，中韩在人民币的跨境业务方面，今后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跨境结算、贸易融资、电子支付等也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高度吻合。

第三，中韩两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大。现在金融业非常突出的一个领域就是金融科技，它与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度结合后，将有力推进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近几年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发展得非常快，今后中韩两国可以就此加强交流合作。2017 年上半年，中国对金融科技的应用率达到 69%，居全球之首，而美国为 33%。2017 年上半年，全球金融科技的投资额是 530.2 亿元，其中中国科技公司获得投资 217 亿元，占全球总投资额的 41%；而美国获得 116 亿元，占全球投资额近 22%。

第四，中韩在绿色金融领域也有很大合作空间。绿色金融现在也是世界金融发展的趋势，中国非常重视绿色金融的发展，最近一两年发展得尤其迅速。2017 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发行了 36 只绿色债券，价值达到 776.7 亿元，比 2016 年同期增长了 278%。2016 年底，中国有色金融环保绿色基金达到了 265 只，其中绿色产业基金达到了 215 只，2016 年一年就增加了 120 多只。这些年中国一直在积极探索推进发展绿色金融，韩国在这方面有不少经验，所以绿色金融是中韩非常契合的发展领域，可以进一步加大合作，发展空间也很大。

第五，加强中韩在区域金融政策协调方面的合作。作为经贸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个国家，有些金融政策，比如货币政策，可以在亚洲区域合作中寻找对接点，促进金融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在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乃至国际金融合作中，我觉得韩国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与中国合作的空间也非常大。

围绕“一带一路”谈中韩经贸发展

■ 赵萍 /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部主任



赵萍

一、在“一带一路”领域，中韩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旨在加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世界各国、国际和地区组织参与。所以，虽然在中国公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中没有韩国，但并不影响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韩国提出的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构想和思路非常契合。中韩之间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目前中韩已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占中国与世界各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总量的四分之一。

未来中韩应该在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方面加强合作。从设施连通角度看，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在很多领域，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技术都位居世界前列。比如中国高铁的速度是全球最快的、铺设里程也是世界最多的。

二、在电子商务领域，中韩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中国的电子商务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目前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大规模。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 7.51 亿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意味着未来电子商务有广阔发展空间。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未来投资机会将更多。

最近这几年，中国在电子商务分支领域——跨境电商领域也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2016 年跨境电子商务收入的增长幅度高达 30.7%。中韩之间贸易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因此在跨境电商基础设施领域，比如：保税仓、海外仓建设等领域，中韩有非常多的合作空间。除此之外，中韩之间产业结构互补性非常强，比如中韩家电产业链上下游各具优势，合作非常紧密。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很多家电品牌已经走向世界，比如最近海信并购日本的东芝，联想并购日本的富士通。中国家电行业的国际化已经进入布局全球的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韩家电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空间也会更加广阔。

三、在贸易畅通方面，中韩也有很大发展潜力

从贸易畅通的角度来说，中韩之间的贸易产品互补性非常强，韩国以高附加值的制成品为主，而中国主要是以初级产品和农产品出口为主。因此，两国的货物贸易互补性比较强，也意味着未来在贸易方式的创新上

有更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随着韩国化妆品、保健品等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以及跨境电商通过小批量、高频率商品进口，在填补一般贸易市场空白的基础上，也满足

未来中韩应该在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方面加强合作。从设施连通角度看，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在很多领域，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技术都位居世界前列。



了中国人民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越来越富裕之后，对于更加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

我认为未来中韩服务贸易的合作空间也非常广阔。比如，像韩国的釜山港和中国的上海港、大连港、青岛港等未来在运输服务贸易方面可以进行更多合作。旅游服务贸易方面，中韩之间的互补特点也比较明显。而旅游服务贸易在中国是一个长期的逆差项目，如何通过中韩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能够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的增长，对于中国来说，肯定是乐见其成。

四、在资金融通方面，中韩有良好的基础

在资金融通方面，中韩之间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韩国 2014 年率先与中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倡议。2015 年韩国又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通过资金融通促进投资增长，需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加强标准互认。因为投资最后落地生产出的产品，如果能够在两国之间实现标准互认，投资的壁垒就会变小。2016 年中国发布的《消费品标准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 年）》总体目标中明确提出“标准制定和实施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重点领域的主要消费品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 95% 以上。”

中韩已经签署自贸协定，未来在投资领域能否率先实现标准互认，将对中韩贸易投资往来有重要影响。

未来中国对外资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 + 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这意味着未来外资准入门槛更低、管理方式

更国际化。我认为投资的便利化对于中韩两国来说，探讨的空间还很大，因为中国未来的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这个对于促进中韩之间的投资增长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韩之间未来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基于中韩之间已有的贸易投资基础，未来会有更多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落地。我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战略对接的基础上，加之已有的中韩自贸协定，中韩之间贸易合作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 中韩经济合作

■ Choi Suhyun / 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前主席



Choi Suhyun

众所周知，经济、金融和贸易与政治、外交、行政、社会、文化等紧密相连，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

中韩两国有多种经济合作模式，国家指定某一特定的区域来加强合作，即经济特区合作就是其中一种，比如上海经济特区、南沙经济特区等。在这方面，全球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都可以学习借鉴。我希望韩国能够跟南沙加强合作。

目前韩中之间的经济合作，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金融领域还比较欠缺。现在韩中两国正在不断加强金融合作，两国主要大银行分别进入彼此国家开展业务，金融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令人欣喜的是，2017 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韩中两国金融领域的合作增加了 32%。人民币在韩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韩国和中国在金融领域有很多共性，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国家通过金融扶持实体经济，金融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

一个手段。债务是维系金融运行的基本元素，目前韩国居民债、企业债过高，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韩国为了减轻这样的负担，在想各种办法，我们也希望与中国能够在这方面展开合作。

现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列全球第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 GDP 排名全球第十。当今世界充满风险，作为世界两个主要经济体，韩中两国在努力发展本国经济，关注本国利益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也要维护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所以，未来韩中两国可以在金融危机防范领域加强合作。比如，储户保险等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加强合作。

在金融、经济合作方面，硬件建设比如把某个地方设定为重点开放的特区，给予特别开放的政策，以国际标准对其进行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另外像中国政府最近采取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政策，深化金融改革等，都将对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我想再强调一点，金融合作里面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和信任，所以韩中两国的金融合作要长期稳定发展，必须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所以希望两国的对话交流能够长期持续下去。

韩国和中国在金融领域有很多共性，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国家通过金融扶持实体经济，金融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

韩国基金市场状况及中韩私募基金的 合作前景

■ Choi Gwangseok / KCN投资公司副总裁



Choi Gwangseok

一、韩国基金制度简况

韩国基金包括专业投资型、经营参与型、创业投资型三大类型。专业投资型基金主要是对房地产、股票、债券进行投资的基金。专业投资型基金须经注册成立，要求资本金 20 亿以上，专业运营人员 3 名以上；经营参与型基金也须经注册成立，要求资本金 1 亿以上，专业运营人员 2 名以上；创业投资基金须获得政府的许可，主要是通过新股认购方式对初创企业和风险企业进行有偿增资，资本金 50 亿以上，专业营运人员 2 名以上。

二、韩国基金市场情况

1. 专业投资型基金市场

截至 2016 年底，专业投资型基金总资产 462 万亿，同比增加 11.8%。其中，专业投资型公募基金是 212 万亿，同比减少了 0.7%；而专业投资型私募基金为 250 万亿，同比增加了 25.2%。最近五年年均增长率，私募基金是 18%，公募基金是 3%。可以看出，韩国的投资型基金当中，私募基金异常活跃。

2. 经营参与型基金市场

截至 2016 年底，经营参与型基金公司共有 383 家，约定出资金额是 62.2 万亿，其中已执行的金额达到 36.6 万亿。2015 年韩国政府将经营参与型基金的成立由许可制转变为注册制，使该基金量有了很大提升。截至 2016 年底，经营参与型基金公司 190 个，最近三年投资执行额年均 9 万亿，投资对象有 230 个国家，86.5% 集中在国内企业。随着部分经营参与型基金公司在海外运营能力得到了印证，其中私募基金在海外投资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11.6%，小幅增加到 13.5%。

3. 创业投资型基金市场

2016 年底，韩国创业投资型基金达到了 610 个，向 3022 个企业进行了投资，主要投资韩国中小企业运营的母基金、韩国风险投资，出资占比 24.5%，金融机构出资 21.8%，民间企业是 14.4%。截至 2016 年底，投资的企业已达 294 个，总投资额达 4.9 万亿。2016 年，在韩国 120 个创业投资型基金公司。韩国风险投资已经和海外 14 个创投公司建立了海外投资基金，金额达到了 1.33 万亿，其中韩国风险投资出资 2000 亿元，2017 年追加了 1120 亿元与海外的创投公司进行合作。

三、韩国私募基金市场的前景以及与中国合作的方案

从上面的一些数据可知，相比公募基金，韩国私募基金的市场更加活跃，所以我们觉得韩国私募基金吸引全球投资的机会更多。特别是韩国的利率跟随美联储的利率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中收益、中风险的另类投资。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美国整体经济复苏以及世界经济越加活跃，对房地产、实体资产、另类投资将会越来越大。对于房地产和海外基建等实体资产，我们觉得中韩两国的金融机构要继续保持关注，而且有必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合作。特别是在中国政府落实“一带一路”政策的时候，我们觉得韩国的另类投资基金和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可以建立联合基金。在投资方式方面，除了原有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以外，私募的私人债券投资方式也应该纳入其中，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在投资之后解决回收的问题。



中国政府 2015 年正式发布《中国制造 2025》战略文件，我们觉得中韩两国可以借此契机通过建立基金，挖掘可以发展成为世界级企业的“潜力股”企业。另外，韩国政府正在运营的韩国风险投资战略，也是为了支持韩国企业走出去与海外风投基金建立联合基金，截至 2017 年已经对外投资 1120 亿韩元，我们觉得中韩两国在这方面也可以寻求合作。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会维持低利率基调，如果中国“一带一路”拓展以及美国经济复苏能够持续的话，我们觉得中韩两国可以针对投资市场寻求更多的合作。

金精不朽 融通天下



- 传播交流成果，探索学术前沿，扩展国际视野，发表权威观点，服务金融事业，满足读者需求。
- 以服务中国经济界、金融界，服务广大读者为使命，致力于 IFF 信息的全面、及时、准确传递，与社会共同分享 IFF 的研究成果。
- 为国际金融合作交流搭建顺畅的信息平台，使对话交流中的重要思路、观念、观点得以传播，服务中国经济和金融业。

着眼宏观大局·关注金融动态·探寻内在规律

《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是反映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的高端学术刊物，面向广大经济界、金融界的读者，以传播中国金融国际合作交流成果，提高中国金融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为宗旨。《国际金融论坛》会刊具有天然的国际信息渠道、丰富的信息资源，利用自身优势，将国外金融信息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成为中国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充分发挥国内、国外双重信息资源的优势，以全球化的视野解读本土的金融事业，站在中国的角度对话世界金融市场，为读者展示一个完整的金融世界。



扫一扫加关注
微信：IFFweixin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国际金融论坛（IFF） 全球战略文库

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是集研究成果、演讲文集、金融领袖及国际金融论坛成员著作为一体的系列出版物，根据每年 IFF 全球年会和研究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出版。IFF 全球战略文库坚持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对全球金融经济问题深入研究。



出版声明：

- * 本刊仅供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得有任何商业用途
-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而成，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复印件、复制品或收入检索数据库系统。

General Statement:

- * This publication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commercial use is prohibited.
- *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materials.
- * Views in the articles of this publication are the original opinions from the author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dat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whatsoever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written consent from the editorial team. Violators may be subject to legal proceedings.



We are dedicated to broader and more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based in China with a global vision. We are devoted to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y playing a bridging role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and main financial cities worldwide.

我们致力于开展更广泛、更包容的全球合作，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携手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城市，架起中国金融界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桥梁，建立全面、广泛的全球合作与对话。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Global Finance F20 (Finance 20)

北京·廣州·上海·香港·華盛頓